

#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建馆 30 周年纪念特刊

(总第六期)



2011 年 11 月



- 4 薛晓峰局长在故居成立 30 周年纪念  
暨上海市志愿者服务基地揭牌仪式上的讲话
- 6 金晓春副馆长在故居成立 30 周年纪念  
暨上海市志愿者服务基地揭牌仪式上的讲话

### 岁月留声

- |                 |     |
|-----------------|-----|
| 8 追忆故居开放前的日子    | 李家炽 |
| 16 宋庆龄故居文物馆筹建经过 | 吴光祥 |
| 25 故居二十年文物工作杂谈  | 刘世襄 |
| 34 保护工程让故居延年益寿  | 毛正东 |
| 39 二十五年故居工作琐忆   | 方国富 |



## 人在故居

- |    |                  |     |
|----|------------------|-----|
| 43 | 一位耄耋老人的心愿        | 陆柳莺 |
| 45 | 邓广殷先生捐赠宋庆龄英文书信始末 | 郑培燕 |
| 55 | 讲解工作给我的感悟        | 蒋慈华 |
| 58 | 谈谈我的讲解工作         | 秦 琰 |
| 66 | 我在故居的这些年         | 徐建华 |
| 70 | 情系宋庆龄故居          | 周炳揆 |

## 图版

- |      |     |
|------|-----|
| 故居光影 | 徐大纲 |
|------|-----|

# 薛晓峰局长在故居成立 30 周年纪念暨上海市志愿者服务基地揭牌仪式上的讲话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非常高兴出席上海宋庆龄故居成立 30 周年纪念暨上海市志愿者服务基地揭牌仪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 1893 年 1 月 27 日出生于上海，她长在上海，她许多政务活动发生在上海，她最后安眠在上海，而上海宋庆龄故居是宋庆龄生前自 1949 年开始居住，居住时间跨度最长的寓所，她对这里怀有深厚而特别的感情，称之为“可爱的家”。这个“可爱的家”不仅是她生活休息的地方，也是她从事工作和开展国务活动的重要场所。她曾经在这里，应邀到北京参加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她也曾在这里，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妇女儿童福利事业和世界和平事业辛勤工作；也是

在这里，宋庆龄热情接待一批又一批国家元首和国际友人、代表团，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可以说，这是一个家，也是一个政务活动的场所，它见证了宋庆龄主席为中国革命和世界进步事业鞠躬尽瘁，奋斗一生。

宋庆龄去世已经过了 30 年，上海宋庆龄故居成立至今也走过了整整 30 个春秋。30 年来，在各级领导的关心下、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在一代又一代宋庆龄故居工作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宋庆龄故居在文物保护、宣传教育、学术研究各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出版了一批有质量、有价值的研究资料，举办了许多纪念展览，积极拓展多种渠道宣传宋庆龄的思想和精神，将宋庆龄留下来的宝贵财富送到了社会大众心中。



▲ 薛晓峰局长在故居成立 30 周年纪念仪式上讲话

今天，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被授予为上海市志愿者服务基地，这也成为今后宋庆龄故居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希望能够吸引并培养更多的志愿者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努力体现上海的城市文明和城市精神；同时也希望上海宋庆龄故居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加快发展步伐，在做好文物保护的基础上，树立服务理念、提升服务水平、改善服务环境，更好地宣传宋庆龄的生平事迹；最后，我借用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先生

的话：“什么是宋庆龄精神？世界的眼光，民主的精神，宽广的胸怀，刚正、勇敢、坚韧。”我们祝福宋庆龄故居更好地发挥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作用，发扬光大宋庆龄的精神。

谢谢大家！



# 金晓春副馆长在故居成立 30 周年 纪念暨上海市志愿者服务基地揭 牌仪式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在这收获的季节，我们相聚在这座美丽的花园，共同庆祝故居三十年回眸暨“上海市志愿者服务基地”揭牌仪式。在此，我谨代表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向光临今天庆祝活动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和各位老同志、老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1981年，宋庆龄去世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她的寓所作为永久性纪念地予以保存，同年10月宋庆龄故居正式成立。

伴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宋庆龄故居已走过了30年的发展历程。在这30年里，一代代故居人以故居为基地，以馆藏文物资源为依托，开展文物保护和藏品研究，举办各类专题展览。在传承故居的历史风貌，弘扬宋

庆龄的伟大精神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故居工作围绕社会发展大局，面向社会公众，强化服务理念，创新服务手段，增强服务能力，使故居的陈列展示、社会教育呈现出新的面貌，文物征集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文物藏品考证、宋庆龄生平思想以及业务工作研究等取得了较好的成果，纪念馆的功能与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故居一直非常重视社会公益和志愿者事业。早在2001年，故居就开始接收和招募了第一批志愿者，时至今日，已先后有上千位来自各高校和中学的学生志愿者以及社区志愿者，以宋故居为基地，开展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今天，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将被授予“上海市志愿者服务基地”，这既是对我们多年来工作的肯



▲ 金晓春副馆长在故居成立 30 周年纪念仪式上讲话

定，更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们将不断拓展志愿者服务基地功能，为志愿者们搭建更多、更好的服务平台，让他们展示自我、服务社会。

30 年来，故居所取得的每一点进步、获得的每一项成绩，都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帮助。借此机会，我向长期以来对故居事业给予关心和支持的各级领导，向为故居发展提供帮助的宋庆龄的亲属及生前友人，向为故居建设出谋划策的专家学者和同行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向所有为故居工作奉献智慧与汗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一代代故居人，表示崇高的敬意！

30 年的历程，为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文博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展望未来，纪念馆的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故居人将怀着对宋庆龄的无比崇敬之情，对故居工作的无比热爱之心，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科学的理念、务实的作风，积极工作，开拓创新，为纪念馆文博事业的持续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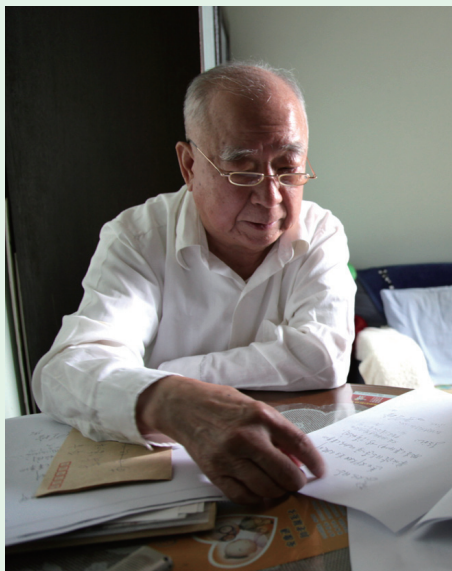
我们坚信，有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有社会各界的关爱与帮助，有世代故居人的勤奋工作，宋庆龄故居这座历史的丰碑定能焕发出更为璀璨的光辉！

谢谢大家！



# 追忆故居开放前的日子

李家炽口述 王宁宁整理



▲ 编者对李家炽进行采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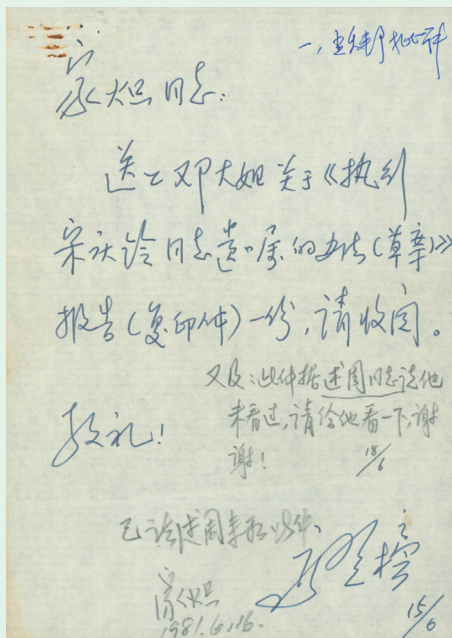
【整理者按】李家炽，1985年离休前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负责处理宋庆龄寓所和孙中山故居的行政事务。宋庆龄逝世后，中央内部成立治丧小组，上海方面由李家炽参加，负责上海故居的清理工作，是上海故居开放前的陈列策划者。本文根据2011年8月及9月的采访记录整理而成。

故居向社会开放已有30年，在宋庆龄逝世后，故居是怎样经过从一个私人寓所到一个社会场所的转变，很多人并不清楚，为此我们采访了当时负责上海故居清理工作的李家炽，他为我们揭开了那段历史的面纱。

## 邓颖超拟定的《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办法（草案）》

1981年5月中旬，宋庆龄病危，中央成立治丧工作小组，我作为上海代表之一参加了工作小组。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去世，6月4日，我在安排好宋庆龄骨灰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安葬仪式后，又返回北京，继续参与处理宋庆龄的身后事，当时住在北京饭店。6月15日，中央办公厅打电话给我，说下午要送一份急件过来，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高登榜的一封信函。信的





▲ 高登榜给李家炽的信

内容是这样的：

家炽同志：

送上邓大姐关于《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办法（草案）》报告（复印件）一份，请收阅。

又及：此件据述周同志说他未看过，请给他看一下，谢谢。

15/6

敬礼！

高登榜

15/6

信中所讲的“述周同志”，是指宋庆龄的秘书杜述周。

这份报告是邓颖超在参加完上海宋庆龄骨灰安葬仪式，返

回北京后起草的。这份报告于1981年6月10日报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胡耀邦当天就批示“同意”。6月14日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也批示“我完全赞成”。

邓大姐关于《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办法（草案）》共有六项内容：

第一条，由有关的同志组成临时小组；

第二条，小组由高登榜、汪志敏、李家炽、杜述周、沈粹缜、童小鹏、廖承志、邓颖超八个人组成，由高登榜同志召集会议；

第三条，小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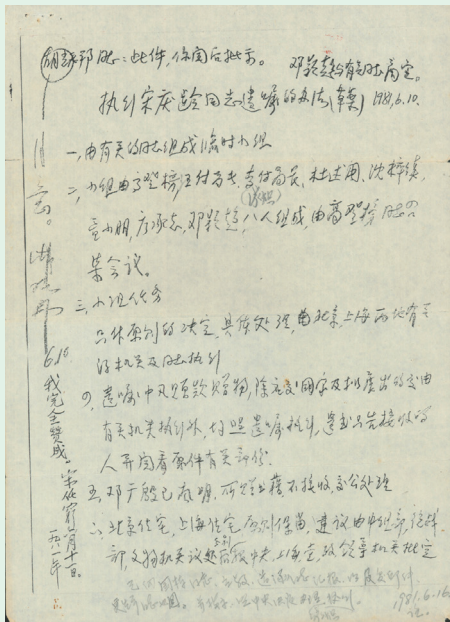
只做原则的决定，具体处理由北京、上海两地有关机关及同志执行；

第四条，遗嘱中凡赠款赠物，除应交国家及拟展出的交有关机关执行外，均照遗嘱执行；遗嘱只告接收人阅看原件有关部分。

第五条，邓广殷已声明，所赠书籍不接收，作交公处理。

第六条，北京住宅，上海住宅原址保留，建议由中组部，统战部，文物机关议处后报中央，





▲ 邓颖超拟定的《执行宋庆龄遗嘱的办法》草案

上海党政领导机关批定。

我收到信后，便向陈国栋（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胡立教（上海市委第二书记）、汪道涵市长、张甦平秘书长做了汇报，他们指示照中央决定办理。

“八人小组”三次会议

为了具体落实《办法》的有关精神，高登榜先后三次在中南海中央办公厅召开“八人小组”会议。第一次会议着重布置具体工作，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北京故居的清理情况。在第三次会议上我汇报了上海故居的清理工作。

后面两次会议比较单一，其他负责人都没有来，就由高登榜召集召开。廖承志参加了第一、第二次会议。就这三次会议而言，第一次会议最为重要。

1981年6月14日上午10点30分，高登榜在北京中南海中央办公厅会议室召集了第一次会议。“八人小组”成员除邓颖超外，全部出席了。

会上，童小鹏第一个讲话，他说：“大姐（邓颖超）因为今天中央党校有个台湾干部学习班，她要去做一次讲话，不能来。执行宋庆龄遗嘱的办法已经经过胡耀邦、宋任穷同志的同意，批下来了。”他口头传达了邓大姐的有关指示：“宋庆龄（北京）的住宅一部分作为宋庆龄故居，一部分作为少年科学宫或少年科学馆，具体是，楼上宋庆龄的卧室，办公室，还有其他房间，楼下的小会客室，小餐厅等宋庆龄个人使用的作为故居。其他都移交北京，作为北京少年儿童科学宫、科学馆使用，由汪志敏执行。上海的住宅作为故居，这个房子是宋庆龄自己的，由李家炽





执行。高登榜负责检查两人执行，执行完毕，要写报告给党中央。”“遗嘱执行完要着手出版宋庆龄的文集，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写报告，由中央文献办公室统一领导，组织有关人员成立编辑委员会，希望明年逝世一周年时出版。文集是政治性的，不是文艺性的。”

接着廖承志说了四点：

“第一，搞一个国际上的公告，国际惯例在领导人逝世后要发感谢公告，向国外表示谢谢；

第二，遗嘱如果被问起，无可奉告，今天的会议给大家传阅的复印件或原件都要存中央档案馆；

第三，遗嘱中分给工作人员、执行人员的，由北京、上海和中山故居统一处理；

第四，家具，油画，国画，餐具，纪念品不能分。”

另外廖承志还提到，要维持故居的本来面目，北京的住宅、上海的住宅、上海中山故居不做任何改变。宋庆龄故居二楼也维持原来的面貌。上海故居清理由李家炽负责，沈粹缜参加；北京

故居由汪志敏负责，沈粹缜，李家炽都参加，总之分门别类清理，关于钱，上海和北京两个故居各管各的。

廖承志又谈到，让原来的工作人员暂时不动，工资照发，老保姆照做工作，搞卫生清洁。花草院子都要保养好，还要防盗窃，鸽子要养好，一切照旧，警卫不撤。

最后廖承志问到：“今年辛亥革命纪念日时，上海故居能够开放么？”我回答说：“我们尽量做好准备，让上海孙中山故居和宋庆龄故居同时开放”。其实孙中山故居原来在内部已经开放了，但是（宋庆龄故居）一下子向社会开放难度很大，因为故居的工作人员都还没有到位。廖承志让高登榜负责北京少年馆的活动，但高登榜认为不太好办。廖承志最后说“搞宋庆龄文选的事情，由童小鹏写报告。请外事组的人起草对外的感谢公告，一个月之内要向国外发出。”

#### 遗嘱中关于隋家姐妹的部分

隋永清和隋永洁是宋庆龄的



警卫秘书隋学芳的女儿，从小活泼、伶俐，很讨宋庆龄喜欢，后来隋学芳中风病倒，宋庆龄对他的两个女儿更是关爱有加，在她们学习和工作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这在宋庆龄的遗嘱中也有所体现。

宋庆龄在遗嘱中提到，要把自己的一些物件在身后赠送给隋家姐妹，还包括部分钱款。廖承志讲，隋家的两个女儿，永清在结婚时宋庆龄已给过她一部分钱，永洁现在国外留学，今后要靠自力更生。他还强调，宋庆龄的遗物应当属于纪念馆，纪念文物，也属于国家文物，如郑板桥的画应该由国家保存，宋庆龄在从事国务活动中外国友人送的礼品也属于国家的，不能分。在这个原则下，执行遗嘱的工作人员找隋永清、隋永洁姐妹多次谈话，让她们懂得以国家和党的利益为重。

### 宋庆龄的遗款

廖承志在会议中提到当时宋庆龄的最高工资是579元，还有300元活动费（接待费），文革

以后她不要了，没有动用过。杜述周补充说，这笔活动费现在估计已有4到5万元左右。又说，1978年12月，宋庆龄在上海居住时有困难，他从北京到上海来给上海市委汇报，市委拨给宋庆龄1万元补助，因宋庆龄对自己很严格，后来并没有接受。

在宋庆龄病危前，中共中央又给她5万块钱，当时让沈粹缜告诉宋庆龄，宋庆龄讲不用了。宋庆龄病危时，有一次我准备要到宋庆龄的家里去，吴庆彤（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来找我说，“中央办公厅交给我5万元，是慰问宋庆龄的，请你转交”。我当时很为难，因为宋庆龄规定是不好收的，但这是中央慰问的钱，如果不收又不太好。考虑到宋庆龄当时已病危，我就暂时收下来了。5月18日我去看望宋庆龄，跟她说，“这是中央慰问您的5万元钱”，她只讲了“谢谢”两个字，别的没有讲什么。5月28日我回到上海，第二天去汇报工作，工作汇报完20分钟后，杜述周告诉我，宋庆龄过世了。不久，中共中央决



定让上海的胡立教，赵祖康（上海市副市长），沈粹缜，中国福利会朱可常（党组书记、副秘书长）和我30号从上海到北京参加治丧活动。去了之后，住在当时的中央办公厅招待所，中央派吴庆彤来看望上海代表团，于是我将支票马上还给他，并转达了宋庆龄讲的话。吴庆彤就将支票收回去了，后来这些钱由邓大姐的秘书赵炜同志处理。

廖承志对这笔钱的处理意见是，现在不动这5万元钱，将来做儿童基金。高登榜也说：“既然国家已经不处理了，是宋庆龄的名义，也可以以宋庆龄的名义存款。”

### 故居开放前的陈列设想

1981年7月下旬，上海寓所进入清理阶段，从市委行政处调用了几位同志参加清理工作，清理历时一个多月，到8月底结束。因清理时间在夏季，天气很热，清理工作相当繁重。为了保证工作的完整无误，按照一件一件来，一箱一箱来，一间一间来的原则，细心谨慎地清理。清理

中碰到有些文物要量尺寸，有些要称分量，都一一做好。寓所三层阁楼上有许多东西，箱子就几十箱，东西很多，因而上海比北京清理时间长。当时故居清理出土物的记录有4大本，可见文物之多。

清理工作从宋庆龄的卧室开始，首先清理的是卫生间壁橱。在壁橱第一格一个老式的文件箱里，发现了许多重要的信件。箱子没有上锁，里面一共有26封宋庆龄选出的珍贵信件。其中包括汪精卫、蒋介石、李宗仁、毛泽东、周恩来等致宋庆龄的信。当时清理出这些信件后，负责清理的同志向市委领导做了汇报，市委有个秘书长从档案的角度，向外发布新闻说，上海在清理故居时发现了一批重要的书信，中央档案馆得知后，派人来上海要。后来市委领导同意将这批重要信件交中央档案馆保存，同时要求中央档案馆制作复制件给上海故居。壁橱中还有一个竹制提篮，里面有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一些重要印章。后来故居还以这些印章为基础出版了一本《宋庆龄



▲ 冯岭安、李家炽在故居揭幕前检查工作

藏印》。

清理人员第一次进入寓所的时候，二楼卧室、办公室的柜子上、桌子上什么都没有。原来宋庆龄离开上海时，怕东西放在外面容易招灰，所以好多东西她都收了起来放在抽屉里，通常是宋庆龄回来时才摆出来布置好。1979年2月是宋庆龄最后一次从上海去北京，1981年5月她在北京去世，没能再回上海。所以上海的家中与她生活在这里时有些不同，如果就照原来样子开放的话，效果并不好。所以，在故居开放前恢复陈列时，我们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将抽屉里的东西都摆了出来。因为这正是她在

家时候的样子。如果什么都不放出来，反而不合情理。

虽然中央有一条原则“基本不动”，但从宣传的角度考虑，还是要尽可能反映出宋庆龄一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妇女儿童、为世界和平做出积极贡献的一面，为此我们在陈列布置时，调整了一些物品的摆放。

比如，原来底层宋庆龄是不挂自己像的，但作为故居开放后，观众没有一个直观的印象，显得有些不足，于是我们把原来客厅门正对面墙上挂的一幅油画换成了一张宋庆龄手持《建国大纲》的照片，照片中的宋庆龄端庄典雅，很有代表性，可以让观众一





进来就看到宋庆龄的形象。客厅里还换了一张照片，就是1961年5月11日毛泽东拜访宋庆龄时两人在客厅里握手的照片。原来这里放的是一张毛泽东的单人照片，换成这张照片一来是考虑到毛泽东一般不到别人家里去，他能够来亲自登门拜访，显示了对宋庆龄的尊重；二来是考虑到把历史照片放在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展出很有说服力，所以我们选择换了这一张。

过道厅中还有一幅宋庆龄的画像，本来也是没有的。故居开放后不久，有位苏联女画家黛丝·雅思巴来参观，她也是宋庆龄的好朋友，当她来到二楼，看到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她为孙中山画的像，非常感动，便照着照片为宋庆龄画了一幅画像送给故居。正是由于这幅画的特别之处，在故居开放初期，就把它放在了过道厅中，后来市里领导来检查工作，并没有提出意见，就这样一直挂出来了。

李燕娥过世后，宋庆龄曾亲手制作过一本相册，里面有宋庆龄与李燕娥晚年的一些照片，当

时宋庆龄是委托我带回上海的。在陈列布置时，我认为把这本相册摆在李大姐的房间里是最合适的，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到，也能深刻感受到宋庆龄对她的感情。所以后来就把这本纪念相册陈列在了李燕娥的书桌上了。还有二楼走廊上一张宋庆龄接受斯大林和平奖时的照片也是开放前决定陈列出来的，这是从宋庆龄一生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以及她为世界和平做出的杰出贡献的角度考虑的。

开放之前，还做了一些文物的保护措施。一是加工了床罩，保护床上的纺织用品；二是规定进门参观要穿鞋套，防止灰尘对地毯造成损坏。

专门为处理领导人的身后事而成立临时小组，对中央来讲是第一次，其他领导人去世都没有成立过。上海宋庆龄故居1981年10月9日揭幕，八人小组基本工作完成，故居后面的工作就不用再向八人小组汇报了，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接管了工作。

# 宋庆龄故居文物馆筹建经过

吴光祥口述 麦灵芝整理

【整理者按】吴光祥同志于1991年起担任上海宋庆龄故居管理处处长，管理处更名纪念馆后任馆长。任期内，他主持了故居文物馆的筹建工作，开创了故居文物工作的新局面。本文根据2010年9月的采访记录并参考故居相关史料整理而成。

我是1991年调到宋庆龄故居管理处担任处长的。之前，我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车辆管理处工作，因为工作关系也来过几次故居，但了解不多。<sup>[1]</sup>到宋故居工作之后，我才逐渐对故居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上海宋庆龄故居是宋庆龄1949年以后长期居住的地方。以前宋庆龄住在法租界莫里爱路那里<sup>[2]</sup>，抗战期间离开上海，

胜利后才回来。她提出将香山路房子交给国家作为孙中山纪念馆，自己暂时住到靖江路（今桃江路）45号。那里比较潮湿，地方也小，很多人认为身为国母的宋庆龄住这样的房子不合适，于是国民政府决定另找一处房子给宋庆龄居住。一直到1949年3月，上海市政府才把淮海路寓所拨归宋庆龄。不久，上海解放了，宋庆龄接受中共中央邀请，北上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经常往来于北京和上海，用她的话来说，到北京是去上班，到上海是回家。<sup>[3]</sup>事实上，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也进行过许多国务活动，开展了不少工作。







◀  
原馆长吴光祥  
在接受采访

——

对我来说，到宋庆龄故居工作是改行了。当时，市孙宋管委会有一条 24 字的工作方针——“保护文物、开展研究、教育后代、扩大宣传、深化改革、提高效益”。我以此为指导，从故居的主要工作着手，寻找突破口。在工作中我了解到，经过十年来的发展，故居文物保护已初见成效，藏品体系也已基本形成，但许多很重要的文献资料和实物，由于缺乏可供展出的场地，只好束之高阁。有些文物因为没有很好的存放条件，已有发霉损坏的迹象。我们专门请上海博物馆定做了一批囊盒，存放重要的文物，空间由此

而更显得捉襟见肘。故居是老式的砖木结构建筑，承重有限，而且还有白蚁的隐患，又不能添置专门的设备。缺少专业的文物库房，成为束缚故居文物保护发展的最大瓶颈。另一方面，从扩大宣传的角度看，宋故居属于遗址类博物馆，无论是底楼的门厅、过道厅、客厅、餐厅以及东西书房，还是二楼的卧室、办公室，均按原样恢复，很有生活气息和感染力，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若是观众想要全面地了解宋庆龄，原状陈列就显得不够了。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采用辅助陈列的方式予以解决，但宋故居并没有多余的房间可以利





用。1988年，宋故居向全社会开放，参观人数成倍增长。我们曾经腾出办公用房，举办过一次只有30件文物的临时展览。但这总归是临时性的，不解决根本问题。1991年我来故居时，主楼建筑刚刚经过一次大修，为了防止参观人流对建筑的承重造成不利影响，决定二楼暂停开放，观众只能参观底楼的几个房间。有的观众对此不理解，我也听到过一些抱怨。为了更好地弥补陈列不足的问题，我们还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过一次宋庆龄生平临时展览，结束后又到南京、重庆、武汉等地巡展。但治标不治本，故居展览的局限性依然存在，已越来越不适应纪念馆陈列展示和宣传教育工作的要求。

最终促使我想从根本上解决文物陈列和库房问题的，是在一次考察之后。那次考察活动是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的，我们去了海南文昌的宋氏祖居、广东中山的孙中山故居、北京的宋庆龄故居等几个地方。我发现他们的文物不多，但陈列展览要比我们强。上海宋庆

龄故居馆藏文物远比他们丰富，就是没有可供展出的场地，许多很有价值的文物一直在库房里睡觉，实在太可惜了。大家一起动脑筋，想找个地方搞陈列，找了2个月也没有结果。无奈之下，我们只好从故居内部考虑。比较来比较去，觉得在故居北面花园的西北角，靠近辅楼的边上建一幢楼倒是蛮好的。那里原来是堆煤的地方，种了些冬青、月季，并不在参观的主线上，对故居的整体影响相对小一些。若是能建一幢两层的小楼，下面做展厅，上面做文物库房，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但是，一想到“故居的一草一木都是文物不能动的”这句话，我们又有很大的顾虑。思前想后，还是先向有关部门汇报一下再说吧！希望能得到领导的理解和支持。

我先向市孙宋管委会提出了在故居建造文物馆的设想，张世福副主任觉得想法不错，市机管局领导也同意了。接着我又去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地面文物保护处，找到李孔三副主任，想不到市文管会也很理解，认为确实

有这个必要。在征得市文管会同意后，我们又去了市规划局，张世福副主任专门与毛佳樑副局长商量此事。听说是为了扩大对宋庆龄同志生平事迹的宣传，她也表示赞同。至于经费方面，也得到了市机管局和市财政部门的支持。应该说一切都比较顺利，看来大家都有保护好宋庆龄文物、学习宋庆龄崇高品格的愿望。

## 二

1996年2月，市机管局正式批复，同意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建造文物仓库和展示厅，总建筑面积400多平方米，投资250多万，并责成局基建处和设计部门密切配合，做好建筑设计工作。

在建筑设计阶段，我们向设计部门提出，文物馆的建筑风格必须与边上的辅楼相一致，包括高度、墙体颜色等等，也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不能误导观众以为是原来的老建筑。作为文物库房和展示厅，还要有现代建筑的特点，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抗震性要强，窗门得选用棕色铝合金的。根据专家意见，为了在

视觉上更加整齐，文物馆北墙必须与围墙平行。但故居的北围墙是斜的，因此只好把文物馆平面设计成了梯形，这样一来外观的视觉效果就好了很多。

文物馆最初设想是建半地下室的二层建筑，向地下要空间是为了增加层高，又不影响建筑的地面总高度，不过这个设计方案后来在审定会上被否决了。记得那一次会议市规划局副总工程师赵天佑、工程师陈薇华，市文管委副主任黄宣佩、办公室副主任杨颂平、地文处副处长李孔三，市房地局总工程师钟永均，市机管局基建处处长诸仁奇，上海前进设计事务所总工程师林俊煌等有关专家都来了。大家先听取了故居文物馆的简要情况和设计方案的介绍，又到实地进行了勘查。专家们认为，根据上海地区地下水位情况，建造半地下室会增加文物保护的难度。他们建议，改变半地下室的方案，分割底层展厅，降低层高。文物馆与辅楼以联廊的方式联结成一体，整体高度按原方案不变，檐口高度与辅楼相一致，屋顶挂瓦部分再加





大坡度和宽度，从视觉上降低建筑物的高度。周围重新进行绿化布置，使新建筑掩印在绿树丛中，与原有建筑浑然一体。

设计方案按照专家意见修改后，5月份进行工程招标，最后是与上海奉贤建筑总公司签订了工程承包合同。市机管局基建处配合施工，故居办公室汤勇同志负责工程的具体工作。6月初正式动工，挖地基时，正好碰着黄梅天，连着下了一个礼拜的雨。挖开的地基与故居辅楼距离很近，我们担心雨水会影响到辅楼，赶紧一面抽水一面用水泥支架支撑，并组织工人运土回填。好在及时采取措施，辅楼未受影响，路面、墙体都没有出现开裂的现象。辅楼地下室原本有一处逃生通道，出口正好在文物馆的位置，施工时也特意把原有的地下设施保留了下来。整个工程大致用了半年时间，12月25日通过了工程质量验收。

与此同时，文物馆内部陈列的筹备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之中，具体由副馆长伍伯容同志和文物资料部主任刘世襄同志负

责。按照宋故居馆藏文物的特点，文物资料部编写了陈列大纲。陈列布展方案设计是请上海沪鸣实业有限公司做的。1997年2月，举行陈列设计方案专家评审会。市孙宋管委会副主任张世福，市机管局副局长李文连，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郭力、蔡振华等参加了评审会。在听取了拟定的陈列内容、布展思路和总体设计方案后，各位领导和专家从陈列环境、版面设计、灯光效果、制作工艺以及文物保护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有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陈列方案定下来之后，就开始了紧张的布展工作。

1997年5月29日，那天是宋庆龄逝世16周年纪念日，宋庆龄故居文物馆正式开馆。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贵璋主持开馆仪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公琦、市委副书记孟建柱为文物馆剪彩，副市长赵启正致词祝贺。市委宣传部部长金炳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贵璋，市政协副主席谢丽娟，海协会会长、上海市宋庆龄研究会会长汪道涵以及市妇联、团市委、市文管委、中



原宋庆龄文物馆陈列

1997年5月29日，宋庆龄文物馆开馆，市委领导前来参观。



国福利会、徐汇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区政协的领导90余人参加了开馆仪式。

### 三

故居文物馆整个展览分为“异国求学，心系华夏”、“精诚无间，笃爱有缘”、“捍卫民权，抵御外侮”、“致力国务，关心妇幼”、“友好往来，维护和平”、“思念亲情，企盼统一”、“伟人长逝、永恒纪念”七个部分，展出文物总共200多件，以馆藏文物为主，其中百分之九十

是首次展出，更有许多是独一无二的珍品。

第一部分“异国求学，心系华夏”。主要展出宋庆龄少年时期的照片、1907年去美国留学时的出国护照、留美学习期间的动物学实验笔记、1913年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校毕业文凭，还有1943年母校授予她名誉法学博士证书等珍贵文物。

第二部分“精诚无间，笃爱有缘”。首次展出了反映宋庆龄、孙中山爱情与婚姻的一本册页，上面有孙中山题写的“精诚





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几个字，还有孙中山为宋庆龄亲笔抄写的《建国大纲》册页、1919年孙中山赠送爱妻的《孙文学说》。宋庆龄长期珍藏的孙中山重要遗物也在这部分作了集中展示，其中有不少孙中山的印章，如1899年兴中会成立时推举孙中山为会长的“总会长印”、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的“中华革命党本部之印”、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时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之印”，以及不同时期孙中山、宋庆龄的私人印章。还有孙中山用过的手枪、帽子、手杖、望远镜。另外孙中山的演讲唱片、日本友人欢迎孙中山到日本的银瓶等都很有特色。

第三部分“捍卫民权，抵御外侮”。具有代表性的文物是1932年宋庆龄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的各类印章、来往信函，例如鲁迅为营救被捕的中共中央委员黄平写给蔡元培、宋庆龄的信，1944年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全体工作人员联名写

给宋庆龄的致敬信等。还有晋察冀边区政府赠送的边区银行货币票样、1945年国民政府授予宋庆龄的抗战胜利勋章、1946年中华全国文艺协会致宋庆龄的签名纪念册，以及周恩来、何香凝、李宗仁写给宋庆龄的信。

第四部分“致力国务，关心妇幼”。主要展出有1949年毛泽东、周恩来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一届政协会议的亲笔信复制件<sup>[4]</sup>，还有1951年宋庆龄获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的奖状和奖章，宋庆龄为武汉东湖九女墩纪念碑题写的“无名烈士诗”、为《儿童时代》的题词等等。

第五部分“友好往来，维护和平”。展出了印度尼西亚总统、巴基斯坦总统、美国总统、锡兰总理、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墨西哥前总统、印度驻华大使以及日本、朝鲜、捷克、波兰等国友人赠送的精美礼品，以及宋庆龄与国际友人之间的来往信函。还有20世纪30年代美国作家斯诺赠送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写的自传性小说《大地的女儿》，这些书的扉页上都有作者题写的



赠言。

第六部分“思念亲情，企盼统一”。主要展示宋庆龄保存的宋氏家族遗物，其中有宋美龄为母亲祝寿写的字幅“福寿全”，宋子良的小提琴、印章，宋蔼龄、宋美龄读书时的教科书以及写给宋庆龄的亲笔信，宋太夫人倪珪贞去世时的纪念章等。这些珍贵的文物都是首次展出，很有故居特色。

第七部分“伟人长逝、永恒纪念”。展示了宋庆龄逝世时举行国葬的照片，以及近些年来宋庆龄的研究成果，包括各种纪念文集、画册、宋庆龄选集、宋庆龄来往书集等等。

#### 四

文物馆建成后，宋故居总算是有辅助陈列场地，虽然面积不大，却对故居的原状陈列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观众来故居参观，不仅能体会宋庆龄在这里生活的真实感受，还能从文物馆更全面地了解宋庆龄的生平事迹。除了文物展示功能，故居的文物保护条件也得到了改善，两

全其美，皆大欢喜。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文物馆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例如，因为建筑总体高度要与原有的辅楼相一致，一楼的层高达不到专业展厅的要求，长幅的字画挂出来就不大好看，好在故居大件文物不多，展厅面积也不大，高度问题还不太明显；二楼作为文物库房，屋顶如果是完全的人字坡顶就好了，对隔热、节能、防漏都更为有利。

2003年，上海宋庆龄故居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sup>[5]</sup>。级别提升了，保护要求也相应提高了，文物馆对宋故居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当时我们煞费苦心，努力把建造文物馆的影响降到最低，但如果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文物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使故居原有风貌发生了变化。如何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大家也是见仁见智。我认为，保护故居的目的不仅仅是保护好建筑、环境那些外在的东西，更主要的还是保护、挖掘其内在的历史文化信息。我们建文物馆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文化信息能够在故居展示



出来，更全面地反映故居的历史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建文物馆还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从实际运作情况来看，文物馆的陈列还是很受观众欢迎的，开馆后来故居参观的人数也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由此可见，建造文物馆对上海宋庆龄故居还是利大于弊。

当年我们在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宋故居旁边建造这样一个多功能文物馆，还是比较大胆的。之所以能够顺利建成，主要还是得到了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前两年，北京宋庆龄故居也在园内建造了库房和展厅，不敢说他们是受了我们的启发，但性质是一样的。其实，在故居内建造文物馆，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和借鉴作用，大多数名人故居即使有这种愿望，也不一定有和我们相同的环境条件。不是万不得已，最好还是利用保护范围内的原有建筑，或者在保护范围之外建造专门的纪念馆。一来故居保护可以更加完整，二来也可以有更加自由的拓展空间。在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范围内建

造任何东西，还是要慎之又慎，千万不能草率行事。保持不可移动文物原有的风貌，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因地制宜地向公众展示更多的历史文化信息，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如何协调好文物保护和利用之间的关系，使两者能够相辅相承有序发展，还有待于我们在工作中不断地探索和总结。

#### 注释

[1] 根据有关规定，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管理和指导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其下属单位的工作。

[2] 即莫里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

[3] 参见王志鲜：《宋庆龄在上海的最后一次搬家》，《世纪》2009年第6期。

[4] 这几封信件原本珍藏在上海故居，后上交中央档案馆保存。文物馆中的展品虽然是复制件，但都是首次公开展出。

[5] 在此之前，宋庆龄故居属于上海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故居二十年文物工作杂谈

刘世襄口述 宫洁菁整理

【整理者按】刘世襄，1987年进入上海宋庆龄故居工作。长期从事文物保管和学术研究工作，1997年起任文物资料部主任，2001年至2008年任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副馆长，任期内主导了藏品管理软件开发、故居大修、文物馆改版等多项重点工作，将故居的文物工作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现任上海宋庆龄陵园管理处副处长。本文根据2011年8月的采访记录并参考故居相关史料整理而成。

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工作了20余年，虽然时间很长，但说实话，我总感觉自己没有做什么事情，有很多工作都还没有做完，有些又做得不够好。但今年既然是建馆三十周年，我想作个回顾也是有必要的，就我所参与的，能回忆得起来的故居文物

工作，谈一些心得，希望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吧。

—

先谈谈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吧。

我是1987年进馆的，当时故居成立不久，上级领导觉得我们故居在研究成果这一方面比较欠缺，所以就决定编写公开出版物。第一本就是《宋庆龄藏印》。当时的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孙宋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益群提出要编写这样一本印谱。这本书发表了27钮印章，都是从宋庆龄的遗物中整理出来的，有宋庆龄珍藏的孙中山的印章，宋庆龄自己的印章，还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印章，全部都以原印章钤拓精印，是孙中山、宋庆龄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历史见证。

这本《宋庆龄藏印》是故居





第一本有关馆藏藏品的公开出版物。我认为它最大的贡献在于把这 27 钮印章的印面以及边款都按原大小拓印下来了，而且非常清楚，完全展现出了印章的风貌。现在外面很多出版物为了版面美观，把印面放大，或者缩小，我认为这些做法欠妥，对展现印章原貌不利。当然，印和拓的过程是很费时的，力度必须拿捏准确，我在这上面花费了一些精力，出来的成果还算比较令人满意吧。

后来这本《宋庆龄藏印》是在 1989 年 1 月 27 日宋庆龄诞辰纪念日出版发行的。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很荣幸的邀请到了时任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和著名画家刘海粟题写书名，上海市政府顾问汪道涵为书作序。

第二个想谈谈的研究成果是 1995 年 12 月出版的《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

当时的馆长吴光祥提出来要编写宋庆龄书信集，我就和黄亚平、麦灵芝、蒋明三位同志一起着手做这件事。大概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做了大量的英文翻译和考证工作。翻译方面得到了外办、

对外友协的大力支持，他们为我们做最后的校译工作；至于一些援华组织名、人物的考证，我们当时特地去北京，向宋庆龄的挚友，《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作者爱泼斯坦先生讨教。当时为了编写这本选集，我们还特意去征集了一些书信，是复印件，我们想的是只要书信的内容真实，是宋庆龄写的，就全部都采用。

在当时来说，这本书应该是全国第一本宋庆龄书信集。让我觉得欣慰的是它直到现在还得到学术界的大力推崇。事实上宋庆龄写出去的信留在故居的大多数都是底稿，也有别人的回信，我想只有有来有往，事情的来龙去脉才能够讲清楚，所以把别人写给她的信也加进去了，这也就是我们这本《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的一个特色，“来往”，既有宋庆龄写给别人的信，也有别人写给宋庆龄的信，而且很多都是一一对应的，这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十分珍贵的史料。另外，所收书信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所以当时的反响是非常强烈



的。两年以后北京所编的《宋庆龄书信集》就大段引用了我们这本选集里的信。

当时我们还为这本书举行了一个首发式，是1996年1月27日，宋庆龄诞辰103周年，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的。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分副部长方全林，市外资委副主任汪均益，市府机管局副局长张世福、李文连，局机关党委书记蔡德生，孙宋管委会副主任陈祥元、顾问华平、李家炽，中福会副秘书长洪绳之，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孙建越等共100余人出席了首发式。仪式是张世福主持的，方全林、华平、孙建越及馆长吴光祥都致了词。

还有一项研究成果，是1998年11月12日出版的《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在沪期间各地来电汇编》。这本书是线装本，书中收录了1922年8月至1923年2月孙中山在沪期间各地来电抄件近200份，大多数都是首次发表，按原大影印，完整公布。

编撰这本书的想法倒是我提出来的。当时有一个橱，还是保

险箱，记不清了，里面全是电报稿，我们进行整理，发现这些电报稿都非常有价值，内容很重要，大多是讨伐陈炯明的，还涉及孙中山在沪期间所进行的国民党改组、军事斗争、政坛斗争等方面。这些电报稿肯定是宋庆龄从孙中山故居带过来的，内容又很翔实，挤掉或许存在的水分是可以看到真实的历史的。所以就决定要编这本书了。

以怎样的方式影印这些电报我们是经过了一番研究的。当时还没有microsoft office word，很多繁体字在电脑上是打不出的，不能改成简体字，而且又想要保持电报稿原来的精神面貌，所以就决定做影印本。又先后考虑了两种影印方式，珂罗版也就是照相版，已经没有机器了，没人做；后来专门做古籍书的上海书店建议我们做石印版，石印出来的颜色，包括纸质都与原件比较接近，而且价格不贵，我们就采用了这个方法。当时上海附近只有富阳有这个技术，我就与麦灵芝、蒋明两位同志带了原件，跑去那里印刷。确实后来出来的



▲ 故居出版的《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在沪期间各地来电汇编》《宋庆龄藏印》、《宋庆龄来往书信集》。

效果非常逼真，以致于还有人利用我们这本书制作了赝品想卖给别的单位。

因为是原文影印，这本书专业性是比较强的。国民政府时期的公文和现在有区别，要弄清楚格式、句读才能看懂。编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些考证工作，把电报内容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都做了一个小传，附在书后。作为重要的历史档案，这本书颇得从事孙中山研究的学者们和机构的推崇，尤其是台湾地区，台北国民党党史馆的馆长邵明煌特地向我要了好几本去。

这本书的首发式是在上海孙中山故居举行的。当时的市委副

书记王力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贵璋、叶叔华、厉无畏、张圣坤，市政协副主席朱达人、王生洪、谢丽娟、郑励志、刘恒椽、陈正兴、黄关从，以及中福会、团市委、市妇联、市工商联等有关社团的领导参加了首发式。

## 二

上面谈的是研究成果，再说到博物馆藏品信息化，我们馆起步也是属于比较早的。1999年底，我们就已经完成了“馆藏文物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发，开始投入使用，实现了文物管理的电子化。

当时文博界有人提出要“电脑化”，那时候还没有数字化的概念，电脑化只是作为一种管理手段，为工作带来方便，当然国家文物局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时批了20万左右的经费，谈了几家公司，上海晨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报价最低，因为它是新成立的，一群年轻的大学生搞的。我们决定和这家公司合作研发藏品系统，也作为一种尝试了。没想到合作以后发现他们的工程



师非常聪明，能准确地理解我们的意图，所以研发的过程也就比较顺利，后来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再碰到过这么优秀的软件工程师，很遗憾。当时研发这个系统有这样几个目的：一是为了推进藏品数字化的进程，二是借此使我们的文物工作更加规范化，三是为减少与文物的直接接触，更好地保护文物。我们这个系统可以说是设置的非常细，有藏品的综合信息、文物账册，还有能反映文物接收、鉴定，以及库房设置、变动、人员进出等工作流程的表单。为了能做好这个信息系统，我们当初也是花了些时间去山东、陕西、河南等各地做调研，采各家所长，因此这个藏品管理信息系统在当时来看，算是比较

领先的。当然从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时候的界面是比较落后的传统界面，那时候是选择了比较易于接受的一种界面形式，要是现在肯定不会再采用了。

1999年11月19日，我们这个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成果汇报会在庆余宾馆举行。市孙宋文管委副主任张世福，市府机管局副局长蔡德生，市文管会常务副主任李俊杰，上海计算机软件中心主任朱三元，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导师陆汝占，复旦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导师胡运发，赛贝斯软件（中国）有限公司华东地区高级业务经理刘敬，南京大学苏富特软件有限公司研究开发部主管李进，上海晨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高鸣，以



▲ 馆藏文物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成果汇报会



▲ 故居工作人员使用文物管理信息系统录入藏品



及上海自然博物馆、“一大”会址纪念馆、鲁迅纪念馆等单位的负责人共4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高鸣介绍了该系统的设计、开发情况并进行了演示。

事实证明,信息系统的投入使用是很有裨益的,我们的工作更加简便而规范了,而且在全国各地也造成了一些影响,反响很不错。在此之后我们还做了一系列的藏品数字化的工作,譬如把宋庆龄珍藏的胶卷、唱片全转换成vcd或cd格式,存入电脑。这个工作是抢救性的,胶卷很危险,是易燃品,在高温的环境下就会有危险,而且这些胶卷、唱片如果不及时数字化,时间长了可能就完全读不出来了。

### 三

我在故居期间经历了两次大修。

第一次是1990年2月13日到1991年3月6日。当时故居的主楼因为长期失修,出现墙面裂缝、瓦片风化渗水、室内油漆龟裂、电路设备老化、下水道不畅等问题,没办法适应对外开放

要求,所以决定进行房屋大修。

那次大修我不是主要负责,我记得维修工程主要包括墙体加固,瓦片翻新,内部粉刷、更新线路、整修路面、安装报警系统等项目。工程竣工后,经过技术部门的勘察鉴定,决定主楼二楼不再向观众开放了。

这次大修时电线电缆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后来就暴露了电力不足的问题,因为保护设备多了,电容就不够了,这个后来在第二次大修前改造好了。

第二次是2006年3月1日到11月14日,这是故居完成建馆以来最全面的一次房屋修缮工程。

工程主要解决主楼的年久失修和二楼的承重问题,实现主楼二楼的对外开放。同时更新改造了供配电、室内温湿度控制、网络系统、给排水系统,以及房屋附属设施,建立了多媒体展示系统和售票、检票、接待统计系统。

我对这次大修最为满意的地方之一就是空调系统的改造工程。以前我们主楼用的是一个个的立式空调,严重破坏了室内原



貌。这次我们动了脑筋，既然每个房间都有水汀，就在原来放水汀的地方放置空调。随之产生的空调排管问题也是，一点没有破坏房屋的原有结构，利用水汀的管道穿进去，一个是没有损伤结构，另一个，风貌忠实于原来了。所以说，这次是没有打一个洞，完成了所有空调的安装。我对房屋修缮一向主张“保持原貌，修旧如旧”，空调改造工程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是比较成功的。

另外一个问题，据我所知，从上至下是没有一个人了解，就

是白蚂蚁问题。对我们这栋砖木结构的主楼来说，如何防止白蚁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发生问题谁也不知道的。以前白蚁防治所出来的老师傅都是很专业的，可以保证三、五年没有问题，现在的人能放心吗？我本人对白蚁的危害有切身体会，它们对房屋的破坏是难以想象的，外面看是完好的，里面很可能已经被蛀空了。现在防治白蚁方面的专业人士是非常匮乏的，因为砖木结构的房子越来越少了，没有人去研究这个了。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



▲ 原副馆长刘世襄在检查主楼大修情况



的，喷的药水的配方应该怎样，应该怎么喷，白蚁的走向是什么样的，都要专业人士研究的。可是现在都没人研究了。两次大修的时候，我们都喷过灭蚁的药水，之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喷洒，我觉得这项工作是必须继续做下去的，而且最好能作为一个文物保护课题提出来，因为只要有白蚁存在，就肯定会对宋庆龄故居、孙中山故居这种房子形成危害。

#### 四

我经历的另外一个“两次”是两次文物馆的陈列布展。

第一次文物馆陈列布置是1997年竣工的。筹备这个展览时我们也去了天津、山东等地方考察。这个展览算是把馆藏文物有一定说法地陈列出来了，以前是没有过的。

文物馆的陈列改版是在2008年初完成的。这次改版相比1997年的陈列，进步是很明显的。首先，我觉得这次的空间布局很好，很有新意，我们这个文物馆面积很小，要做成一个有点规模的展览并不容易，这次设

计公司在这方面花了点功夫，达到了“小中见大”的效果，使参观者不会有局促感；其次，这次展出的文物的珍贵程度大大高于第一次，而且很丰富，有很多都是首次公开；再次，相比1997年的陈列，这次引用了一些多媒体手段，宋庆龄的一份长达51页的手稿得以完整展示，但美中不足的是，多媒体内容还不够深化，多媒体应该是在有限的空间里陈列更多内容，告诉人们更多信息，但这次作用发挥的不够，当然内容的深化是要建立在研究和考证的基础上的；最后一点，这次的展览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最后一个单元“故居生活”，紧扣“在故居”这个主题，因为这个展览的陈列性质还是辅助陈列，不是基本陈列，那么这个单元也就算是对原状陈列做了一个补充说明吧，我觉得这也是比1997年进步的地方。

#### 五

有关珍贵文物的定级工作我们是1998年开展的。按照“文物藏品定级标准”，在馆藏文物





中初步筛选了具有特别重要价值的代表性文物10件，上报国家文物局。我记得当时孙宋文管委还专门为这件事成立了一个文物工作小组。上报后不久，经由国家文物局专家组认定，确认这10件文物为一级文物。

2001年6月25日，故居被国务院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此之前，北京的宋庆龄故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说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一个名人只能有一处故居可以被评为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所以我们上海故居就被列为了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后来，我们自己觉得上海故居的历史价值确实是很高的。首先宋庆龄本人是上海人，她非常热爱上海这片故土，常说“去北京是工作，来上海是回家”，而上海故居作为宋庆龄长期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宋庆龄多次在致友人的信中表达了她对这个寓所的眷恋之情，她去世后我们在这里整理出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包括很多宋庆龄保存的孙中山的遗物，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基于这些考

虑，我们就决定开始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准备了很多材料，也就是在这次申报期间，上海市文管委来为我们做了一套故居建筑的测绘图纸。审批通过后，2001年8月11日，我们举行了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海宋庆龄故居”揭牌仪式。市委宣传部秘书长尹明华，市府机管局局长陈兆丰，市孙宋文管委副主任吕金葆、纪效侠，上博党委副书记金郁文，以及徐汇区天平街道等100余人参加了揭牌仪式。仪式由市文管会主办，纪效侠主持，金郁文、吕金葆和副馆长陆柳莺在仪式上致词，尹明华、陈兆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揭牌。

在故居工作了20年，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还有很多工作没做完，接下去就寄希望于你们了。希望所有问题都能够得到彻底解决。



# 保护工程让故居延年益寿

毛正东口述 麦灵芝整理

【编者按】毛正东，1981年进入上海宋庆龄故居工作，先后在办公室、文资部和宣教部工作，担任过文物资料部、办公室的副主任，是故居的元老。现任故居行政保卫科科长。本文是根据2011年10月的采访记录并参考故居相关资料整理而成。

我是1981年10月初因工作需要组织调动，从市委行政处调到宋庆龄故居工作的，当是还处于筹备阶段。10月9日故居正



▲ 毛正东在安全工作会议上发言

式成立。刚成立时，故居只是接待一些省部级领导和宋庆龄的亲属、好友的参观。一直到1988年5月故居才向全社会开放，还记得那时各界来参观的人流络绎不绝，主动来预约参观的团体也是源源不断。原本只是私人住宅的故居，一下子成为开放的公共场所，每天有大量的参观者进进出出，让故居特别是主楼承受了很大的压力。2年后也就是1990年决定对故居进行一次全面的修缮。大修后，因为担心大量人流进入，二楼的承重承受不了，于是从保护主楼起见，二楼的参观关闭了。代之以在底楼的过道厅里放了几张二楼的彩色灯箱照片。虽然保护工作做好了，很多观众也能理解，但参观内容减少还是件很遗憾的事。为此故居也



一直在想方设法弥补展示内容不足的问题，包括1997年建立了文物馆等等。如何既保护好故居又能满足观众的愿望，一直是我们在思考的问题。

2005年馆领导最后下决心，在故居的第二次修缮工程中解决二楼承重的问题。9月27日馆里组织了一批专家就故居修缮设计方案进行了论证。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秦量、赵福祥、复旦大学副校长、建筑学博士蔡达峰、原上海市规划局总工程师赵天佐、市房科院院长林驹、市文管委地文处谭玉峰、杨颂平、原市房修总公司总工程师方金柏、上海建筑装饰集团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陈中伟等参加了这次论证会。专家们对二楼加固列入这次修缮工程中的方案认为是可行的。

2006年2月故居开始进行全面的修缮，由上海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承接了故居的修缮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任务。修缮工作遵循文物保护以及相关法规实施进行。保留原来建筑的历史风

貌，并结合修缮对原结构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对影响结构安全的构件在不影响外貌的前提下进行加固和调换，努力做到修旧如故。刘世襄副馆长具体负责这项工程的进行，我也参与了修缮工程的一些工作。

### 主楼的隐蔽工程

如何解决主楼的二层的承重问题，是这次大修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加固的方法以不改变故居的原貌为原则，具体实施的方法也出现过一些分歧，后来经过了反复的讨论和论证。最后采用隐蔽的加固措施，二楼木搁栅作局部开放处理，用钢梁对木搁栅进行加固。加固后，再通过检测，达到了二楼可以对外开放的要求，但同时还需要与今后限流相结合，才能根本解决主楼可能出现的承重问题。

这次大修是比较全面的，除了主楼二楼的加固问题，还要解决防潮层的问题。主楼的多处地方曾出现渗漏的现象，我们和施工方对主楼的防潮问题作了全面分析后，认为这次维修要把防潮

与排水两个工程结合起来进行，针对主楼的屋顶防水层局部损坏、瓦片缺损、封檐板朽损等现象。屋面进行了全部翻做，缺损按原样添配。防水层全部更换，采用聚乙烯丙纶防水卷材重新敷设。

故居主楼的水电设施在90年代初大修时原有的电器开关、插座都予以保留使用，还保留了二楼保姆卧室卫生间和底楼厨房的供水。由于室内水管使用年数较长，管道已锈蚀腐烂，出现漏水现象；排水管管道也有锈蚀腐烂；区域内的地下管道年久失修，出现腐蚀，堵塞现象。这次大修保留了原来的水具设施，切断了二楼水源。室内老的水管进行更换，给水管采用PP-R塑料给水管，热熔连接。排水管采用UPVC塑料排水管承插粘接，并放大了管径。

主楼原来的电气线路也出现了老化，有些开关、插座面板有缺损，个别已采用替代品。这次大修把原来室内照明、插座线路全部拆除，重新设计。在不改变结构，以最短路径重新排线，集

中控制照明系统和动力系统。在底层重新设置一配电箱，主楼所有照明，插座，空调电源均由此配电箱引入。原有房间内开关，插座面板保留，在主要房门内隐蔽的地方新安装一只插座，以备除尘打扫卫生用。故居原来的配电间太过狭小，这次大修时在门卫间的隔壁新建了配电间，更新了配电房的设施设备，新安置了计量柜和出线柜各一台，进线在原有基础上扩容10%—20%容量。因为配电间移位，所以从配电间出线柜至各分体配电箱的总线都进行了重新布线，总线采用新电缆直接埋地敷设。

### 恢复历史风貌

故居修缮工作的原则是保留故居原有的历史风貌。这次大修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恢复工作。大概在1985年时，故居主楼的过道厅、餐厅、卧室、内阳台分别设立了大功率的立柜式空调。空调改善了室内参观环境的舒适度，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季和炎热的夏季。但时常有参观者会问：宋庆龄在世时就装空调了吗？尤





其是大功率的立柜空调冷热风风力大而且集中，时间长了，造成局部墙面粉刷层出现开裂剥落现象。为了解决空调引起的问题，也为了还原故居原来的样子，这次大修准备把这些立柜式空调全部取消，但是作为室内的空气调节还是需要的，如何解决这个两难的问题，我们在大修前就开始进行调研工作。最后了解到有一种专门的中央空调很合适在故居主楼里使用。首先它只有一个外机，可以带几个内机，而且内机不是柜式的，也不是挂壁式的，是直接置地放的，这就可以避免柜式空调内机暴露在外或是壁式挂机破坏墙面的问题。那么如何把置地式的空调隐蔽起来呢？几番查看后，发现可以考虑把它放在原来水汀散热器的位置，水汀

外面原有的藤木罩子可以起到隐蔽空调机内机的作用，而且因为是镂空的，不会影响空调出风。主楼的每个房间都有水汀散热器，这也避免了过去空调风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棘手问题就是空调的管子从哪里进出，如果敷设新的管线会影响故居的原貌，最后还是通过利用原来的水汀管子解决了问题。空调的室外机也被安置在花园隐蔽的地方，解决了以前空调外机放在阳台上影响风貌的问题了。

这套新的空调系统安装好后，对恢复故居的原有风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再也不用担心空调机的突兀，影响故居的历史风貌了，而且空调的出风口增加，室内的温差也缩小了，对文物的保护和观



▲ 故居大修后的空调



恢复原貌后的花棚

众参观时的舒适度都大为提高。可以说这是在历史建筑内使用现代保护设备的一个成功案例。

除此以外，这次大修还恢复了主楼前花棚的木结构，该花棚曾经一度被改为铝合金的框架，这次特地找出了历史照片，按照原样重新恢复，这样与历史的原貌就更加吻合了。其次还有辅楼的一些雨棚，也从玻璃钢恢复到白铁皮上绿漆的原来样子。

有些恢复看起来是些细节性的工作，但往往从这些细节中就可以看出某些历史遗址是否真实可信的问题。一个建立在历史遗址上的纪念馆，如果忽略或是随意去除那些历史痕迹的话，那将是可怕的灾难。

故居从成立到现在30年了，共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修缮工程，应该讲在故居保护工作中方

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有些遗憾的地方，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大修中，把辅楼的屋顶瓦片换成了中瓦，希望今后能恢复原来的样子，那就更好了。从理论上来说，故居保护性修缮工程应该保护故居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要让它延年益寿而不是返老还童。后来修复补缺的也要与原来的有所区别，不能以假乱真，也可以让后人读到故居一次次的保护痕迹。修复时的材料、工艺等最好也是可逆的，以便为日后的工作留有余地。在实践中我们也要尽可能地遵循这些原则，那么故居的保护工作就能越做越好了。希望故居的这次保护工程的经验能在今后的保护工作中起到借鉴的作用。



# 二十五年故居工作琐忆

方国富

【编者按】方国富，1986年进入故居工作，负责过办公室和宣教部的工作，是故居第一任工会主席。现为宣教部主任助理。

我是1986年11月从部队转业到上海宋庆龄故居工作的，至今已过去25年了。

刚来时，我在故居的办公室负责行政和后勤工作，还承担了财务出纳的工作。当时作为保障单位，经费的使用、工资的发放，都要到机管局财务处申领、报销。后来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各处室财务由报账转为独立核算单位，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努力地学习财务知识，在上级部门的帮助指导下，建立了故居帐务管理系统。在那段时间里我还具体办理了故居服务部帐务及相关手续证件、故居第一尊宋庆龄雕像和办公用车的相关事宜。为

了提高全体职工福利，我积极参与创收工作，有几年我几乎放弃全年休息在服务部忙碌。

由于同志们的信任和支持，我担任了故居第一任工会主席，此后又连任多届。作为工会主席和党支部班子成员，我每年都会代表单位去探望退休的老同志，于是有幸与曾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前辈们接触。印象比较深的有刘春生、唐江、陆天麟、隋学芳等。他们病重期间我也常代表单位去探望，后来他们先后去世，我又代表单位为他们办理了后事。

陆天麟解放前是国民政府信托局的工作人员。当年中央信托局接到蒋介石的手谕，把现在淮海中路1843号的房子转给了宋庆龄居住使用，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就是陆天麟，他在办理房产事宜中和宋庆龄接触相识。陆老一直称宋庆龄为“孙夫人”。





▲ 2006年大修前，作者在清理主楼文物。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当时按照陈毅市长的要求，陆天麟留在了宋庆龄身边做文书工作。1951年，由于他身体不好，便离开宋庆龄，一直病退在家养病。陆天麟喜欢书法，写得一手好字，没有结过婚，晚年与妹妹一家住在思南路老式里弄房子里，我每月给他送工资时（当初退休工资是自己来单位领或单位派人送），他时常会说起他与孙夫人和陈毅市长交往的一些事情，特别喜欢回忆往事。有时还会把他外甥女的书法、图画给我看。他知道我抽烟，每次我去送工资，他总是准备好一包香烟，看到老先生生活朴素勤俭，我怎么能拿，有时

推却不了，就在临走时放在一楼的厨房灶头上。2001年10月老人过世了。现在回想起当年他与我侃侃而谈的样子还是很清晰的。

另一位是宋庆龄身边的警卫秘书隋学芳，黑龙江人，风度翩翩，后来隋学芳因喝酒中风了瘫痪。虽然我和隋学芳见面的机会不少，但因他长期卧病在床，不能言语，我主要是和他的夫人接触。他夫人叫李淑云，在市安全局工作。夫妇俩膝下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隋永清，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职业演员；二女儿隋永洁经宋庆龄的帮助，到美国求学，现在美国谋生；三女儿隋永卫在中福会工作；儿子隋永兵自由职业。我从与李淑云的交流中可以感受到，隋家与宋庆龄的关系是蛮密切的，隋夫人时常说起她丈夫为宋庆龄工作非常尽心尽责，宋庆龄对他也很信任。当他们结婚有了孩子后，宋庆龄曾请他们搬到自己家里住，就是住在工作人员办公的那幢楼里，后来由于夫妇两人时常为家务事争吵，领导怕影响宋庆龄的







生活，就让他们搬了出去。但宋庆龄对他们的两个女儿隋永清、隋永洁还是非常疼爱的，经常给两个孩子送衣服、送吃的，有时宋庆龄主持的国务活动接待外宾也会带上她们。随着她们一天天长大，宋庆龄在她们的教育、工作上都给予了很大帮助。

2001年隋学芳心脏病复发，在家中猝死。我代表单位协助局人事处的丁建华为他办理了后事。我和隋学芳的三女儿（中福会儿童影剧院工作）到当时的广元路徐汇医院办理死亡证明，到湖南路派出所办理户口注销，最后到龙华殡仪馆操办追悼会。还



▲ 作者在搬运文物

在南鹰饭店为从北京、美国赶来奔丧的隋永清、隋永洁安排了住宿等事宜。

唐江是宋庆龄的厨师，他曾经是上海市的劳动模范，最早他是从锦江饭店临时借过来的，后来宋庆龄对他的厨艺很满意就留了下来。他退休后，我作为工会主席每年两次去他家慰问，每次他总是很热情地招待，冬天烧好红枣赤豆汤，夏天烧好绿豆百合汤等我们，还给我看他的市劳动模范的荣誉证书。他曾对我讲，当年他为宋庆龄烧饭，有时候宋庆龄会亲自到厨房告诉他客人的口味，他便按照夫人的要求去烧。有时客人较多，忙不过来，就请锦江饭店派人来帮忙。

刘春生是宋庆龄的专职司机，说起宋庆龄，刘春生总是心存感激，刘春生有个腿部有残疾的女儿，是宋庆龄出于关心，请有关部门帮她解决了工作问题。宋庆龄去世后，刘春生在故居主要是负责主楼内的卫生工作。时间长了，他有了不少打扫卫生的小窍门，他也很乐意向年青人传授工作技巧。刘春生对故居很是



留恋，一直工作到70岁才退休回家。退休后有一次我们去他家慰问，偶然从邻居那里得知，多年的老邻居从来不知道刘春生在为宋庆龄工作，可见刘春生的保密工作做得有多好。

我在宣教部（当时称群工部）工作了好多年，当时有很多的旅游团，每天的观众络绎不绝，经常是还没到上班时间，旅游团就来了，作为接待组的负责人我总是很早到单位，提前接待，晚上迟些下班。每天早出晚归，加班对我来讲是家常便饭的事。虽然接待工作很繁忙，我仍然很注重部门的业务学习，每星期都要安排一定的时间进行文物陈列讲解的学习培训，定期进行讲解员交流。特别是普通话的学习和礼貌用语，做到每个人都通过了市级单位普通话考核，为讲解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秦琰、蒋慈华两位年青人还参加了上海市优秀讲解员比赛，秦琰得到了三等奖。另外还组织人员定期到兄弟单位学习，吸取别人的长处，完善自己。为更好地发挥宣传作用，我们组织小型展览到学校、部队、

街道去展出。我记得故居还和上海医科大学，签订了共建协议，当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宣教部的主要工作是接待讲解，有好几次重要接待任务，我们都完成得很出色，受到市外办，市警卫局的好评。比如接待越南共产党总书记杜梅、越南国家主席黎德英、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等。为了提升接待讲解的质量、优化参观环境，我们还制定了一些制度，平时定期对参观环境和陈列文物进行卫生和安全检查。群工部是故居的窗口，我们很重视树立良好的形象，每位讲解员都做到热情、周到地接待观众，为此1999年还获得了市府机管局团委命名的“青年文明岗”的称号。

2003年后，因为工作需要，我服从领导的安排回到办公室，担任财务出纳。之后又回宣教部任安全巡视等工作。作为一名党员，我始终服从安排，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做一行爱一行。面对新的岗位、新的要求，努力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比如克服各种困难，学习会计知识并考出了会  
(下转71页)

# 一位耄耋老人的心愿

陆柳莺



▲ 陆柳莺馆长与邓广殷先生  
在香港商讨捐赠事宜

【整理者按】陆柳莺，2001年至2011年任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长。在征集宋庆龄致邓广殷英文书信的工作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现任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党支部书记。

那还是在十年之前，我刚到上海宋庆龄故居工作不久，在处理一桩政协提案时，第一次看到了邓广殷这个名字。在那份提案中邓广殷先生呼吁：应该将北京、上海两地的宋庆龄故居所藏的宋庆龄藏书予以展出，供参观者查阅。在之后的工作交往中，

我对这位老人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渐渐感受和理解了他对宋庆龄及其事业的忠诚和无私奉献。

邓广殷先生是香港崇光置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全国政协第六至第九届委员。其父邓文钊是宋庆龄在香港创立保卫中国同盟时最早的执行委员之一，负责同盟的财务工作。当年，邓文钊先生几乎倾其家产，全力支持抗日救亡活动，解放后曾任广东省副省长，他与宋庆龄的友谊也一直持续了几十年。邓广殷从小深受父亲的影响，对宋庆龄十分景仰。父亲去世后，邓广殷保持着与宋庆龄的通信联系，并经常从香港为宋庆龄寄去她所需要的生活、办公用品和外文书刊。

对邓广殷多年来对自己的照顾和关心，宋庆龄心中充满感激之情，总想以一种合适的方式予以回报。1975年初，宋庆龄接





到北京可能发生地震的消息，便写下了一份“遗嘱”寄给在香港的邓广殷：“如果我有不测发生，我愿意将我北京和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家中的所有书籍赠予邓广殷同志，以答谢他对我的善意。”收到宋庆龄寄来的“遗嘱”后，邓广殷并未对外声张，而是将该份“遗嘱”存入了瑞士银行的保险箱中。1981年，宋庆龄在北京逝世后，由中共中央批准成立“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临时小组，获知了宋庆龄曾有遗赠藏书给邓广殷的信息，即派廖承志征询邓广殷的意见，当时邓广殷虽未曾亲眼看到宋庆龄遗赠给自己的藏书，但他却当即表示愿将宋庆龄遗赠给他的藏书全部捐献给国家。之后这些书籍就分别被上海与北京两地的故居收藏。

当年邓老先生慷慨捐书，是希望这些珍贵的宋庆龄藏书在研究、宣传宋庆龄思想和精神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鉴于当时故居的展示环境与保管条件，这些珍贵的藏书只能被收藏在库房中，未能公开对外展出或提供查阅，此事也成为邓老心中的一个

遗憾。直至2008年，当邓老先生再次来到上海宋庆龄故居时，他欣喜地发现，故居在文物馆陈列改版之时，已将部分宋庆龄藏书公开展出，让这些文物的价值得以体现。已届耄耋之年的邓老先生感到了极大的欣慰，不久，他又决定将自己珍藏的二百余封宋庆龄的亲笔书信捐赠给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希望能予以整理编辑，并明确该出版物为“非卖品 仅供研究”，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研究和传承宋庆龄精神。为了完成耄耋老人的崇高心愿，纪念馆立即组织专业人员着手进行整理编辑，首期刊布了这些珍贵书信的影印本，随后又接受了邓老先生的委托，着手进行书信的翻译工作，当一年后书信的中译本完成印刷刊布时，邓老先生饱含深情地说：“谢谢你们帮我完成了一大心愿”。

今天当我们在研究这些藏书、书信时，对邓广殷这位耄耋老人满怀尊重与感动，正是他的无私之心，让这笔珍贵的文化财富得以展现，而那些被历史烟云包裹着的记忆也得以绵延……

# 邓广殷先生捐赠宋庆龄 英文书信始末

郑培燕

【整理者按】郑培燕，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文物资料部文博馆员，曾参与邓广殷书信的征集与这批书信中英文版的编辑出版工作。

与邓广殷先生结识已经有好几年了。第一次见到邓老，是在故居的西书房。记得那是2006年5月28日，邓老和往年一样，带着家人来故居缅怀他尊敬的伯婆宋庆龄。此次前来，邓老还带来一件珍贵的礼物——宋庆龄送给他女儿邓勤的一件棉袍。听邓老介绍，宋庆龄生前非常关心他和他的家人。数十年前，邓勤在瑞士念书，宋庆龄经常给她写信，鼓励她好好学习，还送给她这件做工非常精细的缎面棉袍。由于香港冬天气温比较高，邓勤又非常珍惜这件礼物，视为珍宝，因

此一直珍藏着没有穿过。多年后，得知宋庆龄故居正在整修，收集宋庆龄遗物，邓勤便托父亲将这件珍贵的礼物捐给上海宋庆龄故居，作为永久的纪念。从那时起，这位满头白发、和蔼可亲的耄耋老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次在故居见到邓老是2008年4月9日，同样是在故居西书房。在与陆馆长的亲切交谈中，邓老得知我馆改版后即将重新开放的文物陈列馆中会展出宋庆龄的部分藏书，他感到非常开心。这些藏书正是多年前宋庆龄去世时立遗嘱赠送给他，而他又无偿捐赠给国家的。这些书，他本人都没有看到过，捐赠给国家后，就在北京和上海的故居保存。当时由于保存环境和条件的限制，上海故居的藏书都存放在库房里，因此邓老来故居缅怀时





1938年，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在香港合影。左起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宋庆龄、克拉克、法朗士、廖承志。

宋庆龄与廖梦醒、廖承志夫妇、邓广殷父女等中外友人在北京寓所合影。



都没能看到。作为当时的政协委员，邓老曾提案呼吁将北京、上海两地宋庆龄故居的藏书予以展出，供参观者查阅。而此次得知宋庆龄的部分藏书在展览馆里展出，他感到非常欣慰。

这次故居之行，邓老对故居亲切感更增，对故居陆馆长也更加信任，便向陆馆长提及家中还珍藏着大量宋庆龄给他和家人的英文亲笔信，而他也希望能让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发挥应有的研究价值，为宋庆龄研究事业做贡献。为了帮助邓老实现多年的心愿，陆馆长提出由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为这些书信出版影集，邓老欣然同意。此后，由

于协助书信影印集的编辑整理工作，我与邓老的接触多了起来，更加了解了这位耄耋老人对宋庆龄的深厚感情和对宋庆龄事业的执着与热爱。

邓老与宋庆龄的友谊始于1971年父亲邓文钊先生去世以后。1971年1月8日，宋庆龄的好友邓文钊因脑溢血在广州逝世，宋庆龄并不知道这一情况，继续给邓文钊写信，还寄去贺卡问候他们全家。邓文钊的夫人何捷书写信将这一消息告诉宋庆龄，宋庆龄立刻回信慰问他的家人，而给宋庆龄的回信是由邓老写的，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通信来往，邓老也接替父亲，从香





港为宋庆龄供应所需生活用品、办公用品，直至宋庆龄去世前几个月。十年中，宋庆龄给他和家人的书信多达近 200 封，足见邓老一家与宋庆龄的深情厚谊，也足见宋庆龄对邓老一家的关心与信任。

在初期给邓老的信中，宋庆龄这样写道：“虽然我还没有见过你，但你亲爱的父亲经常提到你为我们大家做这做那，让我觉得很久以前就认识你了。……”在 1975 年 7 月 23 的信中她写道：“事实上，我把你的家视作我唯一的、一直对我如此之好、帮助如此之大的家。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么多年来你们对我的好。”因此，宋庆龄对邓老非常亲切和信任，视他如同家人，并常在信中对他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谈她如何饱受病痛折磨，谈她对友情的珍惜，对某些人和事的看法，字里行间常常流露出对朋友的关怀和祝福，对朋友的善意相待和友好表示的感激，在她的来信中也真切地表达了她对上海、对上海寓所的无限眷恋之情。

这些书信邓老和家人一直都

精心地保存着。三十年后，为了让公众更了解宋庆龄晚年的思想和生活，邓老经过慎重考虑，愿意将书信内容公开，由我馆编辑出版书信影印集，但是也提出书信影印集要符合珍藏本的标准，并且仅作为研究参考之用。

之后在整理和编辑书信的过程中，我与邓老的接触也多了。由于书信涉及众多人物和事件，很多人物的英文名字我们并不知晓，因此我们多次与邓老书信、传真联系，向邓老请教和求证。馆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还前往香港，就书信集的内容和版式等相关问题与邓老协商。

随着与邓老接触增多，我们对邓老的了解更进一步，对邓老的敬佩也更增了几分。我们了解到，宋庆龄去世以后，邓老对宋庆龄的事业非常关注，也有他独到的见解，认为鼓励优秀教师扎根边远山区和贫困农村，对促进当地教育事业有着重要意义。为此，他出资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合作，在革命老区——安徽金寨、宋庆龄故居——海南文昌、贫困边区——宁



夏固县、河北唐县——白求恩大夫逝世的地方，共同设立了为期十年的优秀教师奖励金，奖励优秀的中小学教师。虽然腰腿不好，行动不便，但他每年坚持不顾旅途颠簸亲自赶到山区颁奖。十年中，共奖励了 1520 名教师。

为使宋庆龄的事业和精神在她的祖籍海南文昌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2001 年宋庆龄逝世 20 周年之际，邓老出资制作了一座宋庆龄半身雕像，捐赠给文昌市庆龄妇幼保健院，座落在该院门诊大楼的大厅内，供后人瞻仰，缅怀宋庆龄的丰功伟绩，继承她的遗志，进一步发展文昌市妇女儿童保健事业。为了提高文昌市妇幼保健医疗水平，自 2006 年起，邓老又出资与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合作制订了文昌市庆龄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 5 年进修计划。5 年内，庆龄妇幼保健院选送 21 名医护人员到上海中福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进行对口专业培训。邓老不仅承担了这些进修医护人员的学习费用，还承担了她们往返的机票。邓老还利用来上海开会的机会，去看望她们，了

解她们的学习情况。邓老的小女儿在英国做医生，邓老曾要求她到文昌庆龄保健院做过义工。2011 年，我陪邓老的小女儿到上海中福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参观，就遇到了在那里进修的文昌市庆龄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她们非常感谢邓老为她们提供的学习机会，也非常珍惜。这些也更增添了我们对邓老的敬佩之情。

在与邓老的接触中，我最喜欢听邓老讲故事。他给我们讲了很多当年他和家人与宋庆龄交往的小故事以及从这些小事情上他所感受到的宋庆龄的高贵品格。邓老告诉我们，在他和家人与宋庆龄的交往中，虽然他一直从香港为宋庆龄提供日常生活用品，但他也强调这并不是单方面的。宋庆龄视他们如同家人，多次在信中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和感谢，亲切地称邓老为“我们的圣诞老人”，还曾经在信中称邓老为“侄孙”。他们对宋庆龄的关心，宋庆龄也会以各种方式加以回报，甚至将一些家传之物赠送给他们。宋庆龄曾经将父亲留给她的





酒送给邓老，将母亲留给她的金耳环送给邓老的女儿邓勤。1972年香港遭遇暴雨，宋庆龄对邓老一家非常挂念，得知他们都很安全，感到很欣慰，并一再表示在安置新家过程中如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她。宋庆龄曾单独立遗嘱，将北京和上海寓所的所有藏书都赠送给邓老。邓老戏称这些书让他在北京饭店“吃了两个星期的皇粮。”当年宋庆龄临终前，邓老是香港唯一受邀赶往北京到宋庆龄病榻前探视的人。参加完宋庆龄遗体在上海的安葬仪式回到北京后，廖承志让他在北京饭店再多住些日子，也没有说明原因。直到两周后邓老母亲向廖承志要人，才知道是为了宋庆龄遗嘱和藏书的事。由于宋庆龄曾嘱咐邓老勿将遗嘱之事告知他人，因此邓老未向廖承志出示遗嘱。廖承志从宋庆龄留存的备份文件中得知宋庆龄曾立遗嘱赠书邓广殷，动员邓老将受赠的宋庆龄藏书捐给国家。随即廖承志代拟了捐赠声明，邓老照抄，将全部图书捐赠国家之后返回香港。邓老至今珍藏着宋庆龄给他的那

份遗嘱，一直保存在瑞士银行的保险箱里。在邓老的心中，这份遗嘱体现了宋庆龄对他的情谊和宋庆龄的一贯为人，即从不忘记别人给过她的帮助，真诚地向每一位帮助过她、为她做过事情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谢，哪怕是极细微的小事。而让邓老最为敬佩的是1975年2月18日，宋庆龄接到北京将发生6级地震的通知。上海的朋友让她返回上海的家，但是为了不引起人民更大的恐慌，宋庆龄决定留在北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北京即将发生地震这一危难将至的紧急时刻，宋庆龄却临危不惧，泰然安排后事，展现了她一切以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为重的胸怀！体现出她沉着坚定的意志！这一点令邓老十分钦佩，难以忘怀。

2010年5月，在馆领导的安排下，我陪同邓老在上海嘉定古漪园与当年“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八人临时小组成员，如今唯一健在的81岁高龄的李家炽先生见面长谈。李家炽先生现任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上海宋庆龄研究会



顾问，1985年离休前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负责处理上海宋庆龄寓所和孙中山故居的行政事务。邓老从李老那里了解到当年对宋庆龄赠送给他的藏书的处理办法。李老至今保存着邓颖超关于《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办法（草案）》报告的复印件。《办法》共有六点内容。其中第五点是：邓广殷（廖承志表兄邓文钊之子）已有声明，所赠书籍，不接收，交公处理。那一天，邓老非常高兴，两位耄耋老人，边喝茶边回忆历史，足足聊了一下午。两位老人在回忆中，不知不觉又回到了当年，仿佛将我也带回了那个年代，让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将这些珍贵的口述历史记录下来，将宋庆龄的珍贵品格发扬光大。

为不辜负邓老对我馆的信任和对我们工作的期望，我们努力让书信影印集达到最令人满意的效果。我馆精心将这些书信原尺寸扫描，纸张、颜色均特别精心挑选，力争最接近书信的原貌，其间数次联系出版社，反复对书信集封面设计及版式做改进，并

为后来多次增加的信件进行补充调整。经过数月的努力，《邓广殷、孙君莲及邓勤藏宋庆龄书信集》（珍藏本）终于完成了，设计精美、装帧考究、每封信都保持原件的年代本色，封面采用了邓老非常喜欢的绿色，邓老非常满意。

2010年5月20日，我馆举行了书信集的首发式，向致力于宋庆龄研究事业的专家、学者赠阅。与此同时，我馆精心筹备的展览也开幕了，展览主题为“海纳百川 明德惟馨”，选取了写给邓文钊、邓广殷、邓勤祖孙三代人的60余封信，作为宋庆龄晚年生活的剪影。从这些书信中，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有着卓越功勋的国家领导人宋庆龄，而是一个风趣、真诚、热情、慈爱的生活中的宋庆龄。展览结合宋庆龄与邓广殷一家的深厚情谊，体现宋庆龄独特的个人品格和宽广的胸怀。活动当天，邓老不顾年迈体弱，和家人赶来上海参加开幕仪式，并向嘉宾赠阅了书信集珍藏本。上海市人大、宣传部宣传处、徐汇区政府、上海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的领导，以及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福利会、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的专家学者等，都参加了这次首发式暨开幕仪式。

在工作中我了解到，将书信内容公布于众，邓老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几年前，就有朋友动员他将宋庆龄的书信辑集出版，但是当时邓老有很多顾虑。因为这些信中的内容多为生活中事，当年宋庆龄非常信任他，信中谈了她对一些人的看法，邓老顾虑公布其中内容会对所涉人物造成伤害。而有些信宋庆龄是要求他保密或者看后销毁的，就是因为宋庆龄不希望信的内容泄露。此外，当时这些书信与其它亲友往来信件夹放在一起，需要花些时间慢慢整理，所以没有答应。随着年事已高，周围了解宋庆龄的老朋友相继离世，了解宋庆龄的人越来越少，很多年轻人对那个时代的历史不了解也不感兴趣，因此邓老觉得非常有必要将这些信的内容公开。在工作中，我还了解到宋庆龄对当年埃德加·斯诺所



▲ 作者与邓广殷先生、金顺德先生、陆柳莺馆长在香港

著的《复始之旅》中关于她和家人的一些描写有失实之处非常不满，曾经将这些内容都写了下来，希望能够加以纠正，否则将变成历史永远流传下去。而当年由于种种原因，斯诺书中的这些内容没有能够得到纠正，也是一大遗憾，邓老希望我馆能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实现宋庆龄的这一愿望。此次书信内容的公布，也让读者了解了宋庆龄对这些描述的看法，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为慎重起见，邓老还特别致电书信中所涉及人物的亲属，确信公布书信内容不会造成任何困扰之后，才决定将书信内容公布与众。

而选择委托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进行书信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也是邓老经过长期考察后做出的慎重决定。通过数次到上海



宋庆龄故居瞻仰，邓老对上海故居以及对陆馆长的信任和亲切感与日俱增，2010年4月，邓老和家人在馆领导的陪同下在档案馆宋故居租用的库房里看到宋庆龄在上海的全部书籍保管得很好，感到很欣慰。他也看到宋庆龄生前常与他提及的“藏酒”，在上海的故居经过特殊处理，保存得非常妥当。此外，我馆工作人员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终选择委托我馆进行书信集的编辑出版事宜。

书信集英文珍藏本推出以后，邓老非常满意。之后，邓老又积极思考如何能让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更好地发挥史料研究的价值。然而这些书信都是用英文书写，能读懂宋庆龄手写体的人很有限，因而，有必要尽快将书信的内容翻译成中文。而此前，我馆在编辑整理英文书信集时，为更好地把握书信内容，已将这些书信进行了初步翻译，作为内部参考资料。得知这一情况，邓老立即决定委托我馆编辑出版书信集的配套中文译本。2011年5

月，这一工作也顺利完成，实现了邓老为宋庆龄研究事业提供史料的愿望。

在此期间，邓老还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将他和家人所珍藏的这些宋庆龄的英文书信全部移交上海宋庆龄故居存放。这也是邓老经过慎重考虑后作出的决定。在工作中，我了解到，作为宋庆龄非常信任的晚辈和友人，邓老深刻了解宋庆龄对上海寓所的感情。上海是宋庆龄出生的地方，淮海中路1843号寓所是宋庆龄的家，因为宋庆龄不止一次在给邓老的信中提到上海的家，字里行间无不透出深深的眷恋之情。邓老相信宋庆龄也希望她的书信能够放在她自己的家里，加之通过几年来对我馆工作的考察，邓老对我馆的工作非常满意，也相信宋庆龄的书信在我馆能够得到妥善的保管。2011年5月29日，在宋庆龄逝世30周年之际，邓老携夫人代表全家将近两百封宋庆龄的英文亲笔书信捐赠给我馆。我馆为邓老举行了捐赠仪式，上海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上海市孙中山宋

2011年5月29日，邓广殷与其夫人在“邓广殷藏宋庆龄书信捐赠仪式”上。



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薛晓峰向邓广殷先生颁发了捐赠证书。参加活动的各界人士包括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宋庆龄及其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百余人见证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邓老非常激动，发表了讲话。他说将宋庆龄的书信放在她自己的家中保存，对他和家人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寄托了他们对宋庆龄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相信这些史料能够得到妥善的保管，也能够更好地发挥史料研究的价值。

在邓老捐赠书信的过程中，有一位要特别感谢的人，就是邓老的好友，原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国福利会对外宣传与联

络处处长金顺德老师。金老师是邓老多年的好朋友，也是邓老特别信任的“政委”，邓老来内地几乎所有活动都由金老师的陪同和协助，多年来屡次陪同邓老赴山区颁发教师奖励基金。此次在我馆编辑刊印《邓广殷、孙君莲及邓勤藏宋庆龄书信集》英文珍藏本及中文译本的过程中，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意见，且克服年迈及家中事务的困难，随我馆赴香港与邓先生会谈，是我们与邓老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对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无私的帮助。与此同时，中国福利会和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也对这项工作提供了大力的支持，为这项工作的圆满完成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在与邓老的接触以及在书信集的编译过程中，我也有很多感触。老一辈人对宋庆龄的这种深厚的感情，不是所有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都能理解的，也是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邓老曾经对我说希望我好好研究一下这些信，信中提到的每个人，每件事的后面，都有故事，都值得研究。我的感受也确实如此，这些信我看了数十遍，每次都有新的启发。同时我也感到，正是由于邓老的无私，我们才得以了解这些信的内容，才能够了解、亲近、缅怀这位值得尊敬的女性。

邓老捐赠的这些书信，无疑对宋庆龄研究事业是一批重要的资料，在当前宋庆龄研究史料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丰富了我馆的馆藏。而这些书信内容的公布，



▲ 《邓广殷、孙君莲及邓勤藏宋庆龄书信集》中英文版

中译本的推出，方便了广大学者阅读，为那些宋庆龄研究的专家和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史料，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推动了宋庆龄研究事业的发展。广大读者、学者通过阅读宋庆龄书信集，可以真实地了解宋庆龄的崇高思想、高贵品德和为人处事的态度，以及对重大事件的原则立场。这为我们了解有血有肉的宋庆龄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在当前全国人民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势下，这些书信内容的公开，对于在全社会，尤其是在广大青少年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宋庆龄的宝贵精神财富，培养良好的道德规范，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今年是宋庆龄逝世30周年，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这位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我们一定不会辜负邓老的重托和希望，不仅要将这些珍贵的资料妥善保管，也会充分发挥它们的研究价值，也一定会继续加倍努力，弘扬宋庆龄的高尚品格，将宋庆龄的事业发扬光大。

# 讲解工作给我的感悟

蒋慈华

【编者按】蒋慈华，1997年进入上海宋庆龄故居工作，任讲解员，后任故居宣传教育部主任，长期从事宣教工作，现任故居办公室主任。

感悟之一：“能在这里工作，你们真幸福！”这是在十多年的讲解工作中，和游客交流时，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讲解员在一线工作，是馆里与游客接触最多、时间最长的人，是纪念馆与游客之间的纽带。每天接待的游客中，年龄各异、职业不同，参观的动机也不尽相同，但绝大多数游客是满怀着崇敬走进这座庭院的。这些普通或不普通的参观者总是给我很多感动。记得有一次周日当班，接到通知说有福建人大的领导要来参观，让我做好接待准备。一见面，是

一位中年女士，举止优雅、面容慈祥。她握着我的手亲切地说：“我今天，起了个大早，沐浴更衣。我是带着朝圣的心情来的。”还有一次，是一位父亲带着他的两个孩子来参观。因为没穿鞋，在门口检票时，被保安拦了下来。这位父亲很为难，他没有鞋，可他真的很想让孩子们看看宋奶奶的家。保安找来了自己的一双旧皮鞋，让他穿上进馆参观。在交谈中，我们了解到，这位父亲在上海靠捡拾废品来维持生计，经常从门口路过。这次两个孩子放假，来上海看父亲，他想带他们进来看看。后来，保安跟我说，那位父亲把皮鞋还给了他，他说他不习惯穿鞋。

在伟人生活过的地方工作，真幸福！别人可能偶尔来一次，或者一辈子只来一次，而我们可





以天天在这里，耳濡目染她的气息，渐渐地她在我们心里鲜活起来。客厅内，她与各国友人谈笑风生，畅叙友谊；书房里，她挑灯夜战，为国事操劳；鸽棚前，她精心喂养着可爱的小精灵；花园里，她缓缓地漫步，是否在思念着亲人？可能是爱屋及乌吧，这里的一草一木、每一件摆设都有了生命。每天做完保洁之后，开放前我都要把游客参观区域巡视一遍，看看照片是否挂正，展品是否摆妥。每次清洗工作服，我都会把它熨烫平整再穿。我要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每一位游客。因为，我爱我的工作。

**感悟之二：讲解应该是尽可能客观的表述。**

讲解是一门语言艺术，它对讲解员其实是有着很高要求的。记得那时刚进馆不久，为了丰富讲解内容，吸引游客的注意。我看了一些宋庆龄的传记和相关书籍，并把其中觉得讲解用得到的内容摘抄下来。记得一次讲到三姐妹年轻时的照片，我说三姐妹受到了良好的家庭熏陶和学校教

育，为她们日后的成就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而宋庆龄无疑是她们中最爱国的。当即，一位先生表示异议，他说，宋美龄在抗战时期也做了很多爱国救国的事，影响很大。而且他说，讲解员应该讲事实，让游客自己得出结论。他说的是对的，我羞愧难当。目前，社会上对讲解员语音语调等基本素质的培训比较重视，会有各类培训班，但对于讲解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和思考，还有待深入。

**感悟之三：观众能感受到你乐于为他们服务的心。**

近些年来，我馆不断完善服务设施，取消了执行多年的午休制度，以方便游客。馆里还特别重视游客的意见和建议。一次，游客留言认为主楼门前停车，影响环境和氛围。馆领导得知后，立刻安排馆公务车停到了别处。没有了原来门廊的遮挡，加重了车辆清洗的工作量。但游客提的意见对，就坚决整改！馆领导的态度也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认识到让游客满意是我们永远的宗旨和目标。





▲ 作者在为孙中山后人孙治平等讲解

讲解是一项服务工作，这已经为大家所共识。讲解员要以自己的学识和精湛的讲解技巧，为游客提供精神的给养。尽管从内容上来看，讲解是在传播知识。但这种面对面的方式，使得讲解具备了情感与信息并存的交流功能。我们首先要愿意讲，愿意把对宋庆龄的了解通过文物告诉大家，增进他们对伟人的认识。如果你没有这份意愿，那对从事讲解工作的人来说是痛苦的。即使把讲解词背得再熟练，没有感情的叙述，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世博会期间，有一位来自香港的母亲带着有些智障的儿子来馆参观。定时讲解开始了，母亲

领着差不多一样高的儿子一起来听讲解。可能是人比较多，儿子很兴奋。讲解员讲一句，他跟学一句。游客们面面相觑，母亲也有些尴尬。看到这种情景，我立刻上前对这位母亲说，我先陪你们到楼上参观，好吗？母亲马上点头说好。从楼上开始，我始终面带微笑，用启发式的语言与孩子交流，看得出他很开心。参观结束时，那位母亲歉意地表示给我们添麻烦了，对我馆周到的服务表示感谢。其实，我没有告诉她，我很感谢她，给我们上了一课，谁说残障的人就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呢。尊重生命，以人为本，这该是生活的真谛吧。



# 谈谈我的讲解工作

秦 琰

【编者按】秦琰，1997年调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工作，任讲解员。曾获上海市讲解员比赛三等奖，是故居宣传教育部的业务骨干。现任故居宣传教育部副主任。

1997年2月，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为即将落成的文物馆招聘讲解员，这是宋故居建馆以来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也正是由于这一次难得的机会使我有幸进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工作，踏上了为文博事业献身的道路。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就是在这个举世瞩目的日子里，我正式进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工作。一个全新的环境和一份全新的工作，也成为我人生一个新的起点。

2011年10月，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迎来了建馆三十周

年，而我在这里工作也已经有十四个头了。回想这一路走来的岁月，不禁感叹纪念馆工作变化发展之巨大，同时也觉得应该对自己最熟悉的纪念馆宣教工作做一下回顾。

虽然已过去了十多年，可是第一天来到故居上班的情景却仿佛犹在眼前一般的清晰。当我踏入宋庆龄故居的那扇大门时，优雅的庭院、参天的古树，满眼见到的都是生机盎然的绿色，空气仿佛也清新了许多。那幢红瓦白墙的小楼就掩映在这绿树丛中，整个院落显得那么优雅而静谧，而身后热闹喧哗的淮海路似乎就被这扇大门隔成了另一个世界，想到自己将要在这样优美的环境里工作，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

那个时候宣传教育部还叫做群众工作部，部门里大多是些四、五十岁比较年长的同志，没





有专门的办公室，更没有一人一张的办公桌，只是在主楼的厨房里放置了两张沙发作为员工的休息室。我第一天上班的内容就是熟悉主楼的讲解词，薄薄的两三张稿纸便已囊括了所有讲解的内容。如果按工作量来划分的话，那个时期讲解员所承担的最主要任务是主楼和文物馆的安全保卫工作，其次是主楼和文物馆的日常保洁工作，最后才是讲解工作。因为当时来故居参观的游客以东南亚旅游团为主，讲解都是由带团的导游自行完成，对于散客和国内的一些团队我们并不主动提供讲解服务，只有特别的贵宾来访时才需要我们讲解，所以当时的实践机会也是比较少的，有时候一星期都讲不到一批。在游客参观量不大的情况下，部门主任经常会安排半天时间，让我们在主楼里搞卫生。

在进入故居工作之前，我并未受到过任何专业的培训，讲解技巧都是靠自己在实践中摸索，那些经常带团来的导游们就成了我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但是我没有意识到导游讲解与讲解员讲

解之间的重要区别，即讲解内容的深度和广度的区别，讲解使用的语言、态度的区别。导游可以以趣味夸张的解说来达到娱乐观众的目的，但讲解员应该力求以严谨的态度有事实依据地为观众进行解说。所以在我进入故居工作后不久，在馆领导对我们进行讲解考核时，伍伯容馆长就指出了我的这个问题。在介绍到过厅墙上徐悲鸿的《双马图》时，我讲道：“徐悲鸿画马有一个特点，画天不画地，画地不画天，而我们在这幅画上既看到了天又看到了地，这表示徐悲鸿大师赞扬宋庆龄是一位顶天立地的人。”这段解说词并不在我们的讲解稿中，是我在听了某位导游的解说后觉得挺有意义的，观众一定会喜欢听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所以我在讲解的时候就把这段内容加了进去。伍馆长对我说：“你讲的这段话或许会加深游客对这幅画的印象，可是却没有事实依据。宋庆龄故居是一个政治性比较强的地方，面对不同的观众，我们的讲解一定要反应客观事实，内容一定要经过考证。”馆



长的教导使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让我了解到讲解员对于讲解内容上的把握一定要力求真实，而不能道听途说、哗众取宠。

在一段时间的思考和摸索后，我感到宋庆龄故居讲解员的讲解方式应该有别与其他革命类的纪念馆，因为这里是宋庆龄心中“可爱的家”，讲解员的气质一定要与这里的整体环境与氛围相适应。亲切自然的表情、落落大方的仪态，朴实动人的语言，也就成了我最想要表现的方式和风格。记得2006年单位派我和另两名同事一起赴西安参加陕西省博物馆学会第十七届讲解员培训班，来自于全国各地近四十名讲解员参加了此次培训，在毕业典礼上选取了4名学员作为代表进行培训成果汇报，我也作为其中之一进行了示范讲解。与会的陕西省文物局领导在总结发言时特别地提到了我的讲解风格并表示这种从容大方，亲切自然的讲解方式让他仿佛感受到了宋庆龄故居优美的环境，很想亲自去参观一下。

可能因为自己毕业于师范学

校，曾受过一定的语言和形体上的训练，所以具备了讲解员所需的一些基本素质，也使得我的讲解逐渐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以及游客们的肯定。1999年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下属三家单位进行“优秀讲解员达标入围及评比活动”，如果当时不是同事们鼓励我，我还没有勇气报名参加这次竞赛，并达标入围。经过第二轮的评选，管委会系统下属三家单位共评出了两名“示范讲解员”，而我也有幸成为了其中之一。不久之后，单位又选派我参加了上海市文博系统讲解比赛，我获得了革命组的三等奖，这是自宋故居成立以来第一次有讲解员在此类比赛中获得奖项，正是因为有领导和同事们对我的信任和鼓励，我才能取得这一点小小的成绩，也让我更坚定了信心要把讲解工作做好。

虽然当时日常的接待讲解量并不大，但是却有更多的机会与游客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要提高讲解的整体水平，讲解内容决不能只停留在那份讲解稿上，要



◀ 2001年5月，作者在接待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



◀ 2003年，作者在为参观故居的全国政协委员讲解。

通过不断地学习来充实讲解的内容，让带着不同目的前来参观的游客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取足够多的信息。同时讲解员还需要不断进行其他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以应对游客提出的各类问题。在这个学习过程中，群工部的老同志们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很多当时讲稿上没有的内容，正是通过在这里工作多年的老同志的介绍才让我了解到，并实际运用到自己的讲解工作当中。

主楼一层的房间里悬挂或摆放着的那些照片就曾让我产生过

一些疑惑，比如说客厅的南墙下面有一张周恩来与陈毅的合照，原照应该是宋庆龄与这两位领导人一起的合影，讲解词上说宋庆龄是为表示谦虚所以将自己那部分给剪掉了，可是就在这张照片的上方却挂着宋庆龄与毛主席的大幅合影，仔细思考的话会让人觉得讲解词上的说法似乎有些矛盾。于是我便去询问部门的老同志，老同志告诉我：“宋庆龄为人是非常谦虚的，她不会在接待客人的地方摆放自己的相片，在这里成为故居开放后，出于宣传





的需要，有些照片被更换过。”老同志的这番话解开了我心中的疑惑，从此遇到问题我都会主动地去问他们。

还有个例子，是关于苏联女画家黛丝·雅斯巴为宋庆龄所画的那幅素描像，当时的讲稿上也没有过多地说明这幅画的来历，我是通过询问在故居工作时间最长的毛老师后，才了解到了这幅画背后的故事：

“宋庆龄去世后，苏联女画家黛丝·雅斯巴前来故居缅怀，她惊喜地发现自己多年前为孙中山先生所画的素描像竟被保存的如此完好，并悬挂于办公室的墙上。宋庆龄对其作品珍爱的程度，使得黛丝·雅斯巴深为感动并迫切地希望能为宋庆龄画一幅像以寄托哀思，女画家当时还曾向这里的工作人员提出想要一张宋庆龄的相片作临摹之用，但是出于种种原因当时的工作人员并没有答应她，于是她便自己出资购买了一张宋庆龄的相片，并于一年后将完成的作品赠与我馆。”

在知道了这些故事后，我不断地在原有的基础上对自己的讲

解内容进行补充和修改，一遇到问题就询问老同志或查阅相关资料，而老同志总是不厌其烦地帮助我。从他们的身上，我学到了对待文物保护工作所应具备的细心严谨的态度，爱护单位如同爱护自己家一般的强烈责任感，以及在与游客交流中时时流露出的对于宋庆龄的那种无限崇敬之情。从群工部的老讲解员滕营美和周宝芬的身上，更让我领悟到了讲解技巧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部分并不在于讲解员的声音要多么动听，手势表情要多么到位，语言表达要多么标准。讲解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应该是：讲解员能准确地将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与情感传递给观众，并使观众产生共鸣。从她们的身上我学到了：想要感动观众，首先要感动自己。滕老师和周老师既没有受过什么高等的教育，也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课程的训练，可是她们却凭着自己对伟人的敬仰之情、对游客们亲切负责的态度以及多年工作所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即使她们使用的是最朴实的语言，可还是照样能打动观众，并不止一次



地在讲解过程中令前来参观的游客流下感动的眼泪。近年来，我馆在对游客提供讲解服务的数量方面比过去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可是在讲解过程中能令游客感动落泪的事例却几乎没再发生过，其中的原因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文博事业因此显出了一派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人把参观博物馆和纪念馆纳入外出旅游及业余休闲活动的主要项目之一。纪念馆的宣传教育职能在整个纪念馆工作中所占的比重也逐步增加，越来越受到重视。近十年来，故居在外部参观环境、文物保护技防措施和员工的办公条件等硬件方面有了巨大的改善，在规范管理、人员素质、专业培训、服务质量等软件方面也有了明显的进步。

群众工作部为适应纪念馆发展的需要更名为宣传教育部，为文博事业默默无闻奉献多年的一些老同志们也先后到了退休的年龄或转到别的岗位，一批刚走出

大学校门富有活力和朝气的年轻人相继加入到了宣教工作队伍中来，使宣教部的人员结构和整体素质有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当时任我馆宣教部主任，现为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馆长的刘金驰对充分发挥本部门对外的宣传教育职能以及提升宣教部在整个纪念馆中的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的带领下，讲解员们开始重视对业务知识的学习，他善于发现讲解员们的不同性格特点，让每个人都有表现和发挥特长的机会。他让大家分工合作、整理编写了业务学习资料《宋庆龄同世界各国的交往》。之后每年，结合当年时事又先后让我编写了《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宋庆龄与新中国》、《宋庆龄与中国抗日战争》等主题宣讲稿，带着这些讲座我们走出故居的大门，走入部队、走进学校、深入社区和街道开展了几十场的主题宣讲活动，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的同时也锻炼了宣教部的队伍。

2004年4月，在陆柳莺馆长的大力支持和刘金驰主任的带



领下，我们募集到了企业的赞助资金人民币3万元，宣教部开始着手策划在本市徐汇区所属的中学内开展“怀念宋庆龄——中学生双语征文比赛”的活动，同时我们还联系了徐汇区教育局、文化局并取得他们的支持。从前期的撰写活动方案、竞赛启事，到亲自走访一所所学校，拜会校领导，争取学校的协助和支持；在征文活动期间，为前来参观的参赛学生们认真仔细地讲解，帮助他们了解宋庆龄、感受宋庆龄；收到学生的参赛作品后，联系评委、认真组织评审工作；直到后期颁奖仪式的筹备、策划、主持以及媒体联系等，所有这些工作都是由宣教部的讲解员们完成的。此次活动共有十四所中学1000多名学生撰稿参赛，经学

校推荐共收到征文257篇，获奖的部分作品还被刊登在一份向全国发行的周刊《男孩女孩》上。正是通过这次活动，宣教部打开了一扇纪念馆作为教育基地的大门，为宋故居作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本市13所中学里设立“宋庆龄班”这一品牌项目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整个活动中，宣教部的讲解员们又一次接受了锻炼、获取了宝贵的经验，也是一次讲解员体现自我能力和价值的机会。

2006年宋故居大修期间，刘主任又再一次组织我们编写策划了《宋庆龄在上海》图片文物展，这是我进入宋庆龄故居工作后第一次去外地巡展，也是故居自建馆以来第一次由讲解员们自行编写策划的展览。在整个项目中我负责编写宋庆龄在建国以后致力国务、关心妇女儿童事业这部分的内容，在刘主任的鼓励和充分信任下，我还承担起了整个展览的图片资料收集、整理、挑选以及所有展板的排版工作。带着这个展览我们先后来到了广东中山翠亨村的孙中山纪念馆和广



▲ 作者与同事在主持建馆30周年纪念馆活动





州大总统府。在广州大总统府展览的时候，我特地从上海赶到广州做了展览开幕式的讲解工作。

随着宣教部工作开展越来越丰富和多样化，以及馆领导对纪念馆未来发展道路的前瞻性和对纪念馆人才培养的重视，宣教部的年轻讲解员们得到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和发展空间。正是从这时期开始，我馆讲解员这个岗位的性质和职能也在悄悄地产生着变化，从早期保安、保洁、讲解三员一体偏向于体力劳动的工作逐渐转变为要能讲会写、懂得学习和研究的方法，善于组织策划、了解市场营销知识的多元化复合型工作。从联系建立对外教育网络，撰写适应不同人群的主题宣讲稿，到组织策划各类主题活动和巡回展览；从编写培训教材、制定培训计划，培养一支具有专业素质的志愿者队伍，到善于学习和总结，每年完成一定数量的业务研究论文。如今“讲解员”这个岗位从名称上来看，已经无法再体现宣教部工作人员实际所承担的任务，我觉得宣教部门更可以作为纪念馆的人才培养基

地，为纪念馆未来发展的需要培养和锻炼出更多复合型的人才。

已经算不清究竟有多少人对我讲过这句话：“真羡慕你们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的确，这样的感觉从我进入故居工作的第一天起就从未改变。随着在这里工作年份的增加，我能有更多的机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对这里曾经的主人——宋庆龄有更真实、更深入的了解。在宋庆龄那特有的东方女性的柔美外表下，我看到的是无比强大的内心，她在具有坚毅个性的同时，也有着比常人更为丰富而细腻的情感，她散发出的那种人性的光辉时时刻刻地震撼着我的心灵。所以，让我感到幸运的不仅是因为工作在这优美的环境里，更重要的是我工作的地方曾经居住着一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宋庆龄。作为纪念馆宣教部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有义务更有责任让所有的人都了解这位伟大的女性。我坚信，历史不会被淡忘，宋庆龄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而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的未来也将更加美好！

# 我在故居的这些年

徐建华

【编者按】徐建华，1982年进入上海宋庆龄故居工作，曾担任宣教部副主任。现在故居文物资料部工作，任文博馆员。

弹指一挥间，上海宋庆龄故居于1981年10月揭牌成立至今已走过了30年的历程。经过几任故居领导和文物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和奉献，故居已发展成为基础设施完善、馆藏资源丰富、陈列展示先进的纪念馆和开拓创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文博事业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82年12月，我有幸调到了上海宋庆龄故居工作。那天，我到故居报到，看到两扇紧闭的大铁门。我按了门铃，开门的是一位解放军战士（现武警），我很吃惊，这里怎么会有解放军警



▲ 作者在浦东国际会议中心为故居做旅游推广

卫，后来才知道上海解放初宋庆龄寓所就有部队警卫。走入宁静雅致的院落，对我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在几十棵百年香樟树的掩映下，静静地矗立着一幢灰白色欧式假三层小楼，原来这就是宋庆龄女士的寓所。不久，我在故居领导和同事，特别是曾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两位老同志的帮助指导下，很快适应了这里的工作。

我最初被安排在接待组（现宣教部）。当时故居是内部开放，





只接待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和相关的团体参观。平时我在陈列室负责文物保护，有接待任务时我就拍照。为了把工作做好，我努力学习摄影技术，当时都是黑白照片，我自己动手冲底片、扩印照片。领导也很支持，专门开辟了一个暗房，让我边学边干，二十多年下来也为故居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三十周年馆庆前夕，当我看到那些几十年前拍的照片都成为了历史，真的很感慨。我在故居纪念馆工作近三十年，拍摄了大量照片，有宣传接待中的领导参观照片、各类故居纪念馆活动展览的照片、外地巡展照片、文物照片、故居纪念馆画册中的照片、故居纪念馆两次大的修缮工程和多次局部维修照片、馆刊图版照片等。在工作多年后，我积累了一些经验，撰写了一些文章，并在馆刊上发表。

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我调去了文物组（现文资部），对宋庆龄身前遗留下来的遗物进行整理登记，每件都要量尺寸、制卡片、做账、拍照，然后入库。为了保护故居书房内的大量藏书，我把

陈列在书房里的全部书籍整体拍照放大，代替了原有藏书进行陈列，效果还是蛮好的。

由于故居参观人数不断增多，我又回到了接待岗位。1988年5月，宋庆龄故居对社会全面开放，对故居的接待工作产生了很大压力。为了应对这一情况，故居全员出动参加接待。记得有一次，长宁区某公司来参观，把陈列室换鞋间的纱门都挤断了，可以想象当时参观的观众之多。经过故居全体人员的齐心协力，我们一次次地圆满完成了接待工作，包括重要接待任务。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大量的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来上海参观旅游，这些港澳台同胞也会来上海宋庆龄故居参观瞻仰。当时每天都有几十个团参观，最多的一天有七十二个团，对故居建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了保护故居建筑，我们暂停了对主楼二楼的开放。1996年，经过多方努力，建造了宋庆龄文物馆，1997年对外开放，弥补了陈列展览的不足。为了扩大对外宣传，我们制作了《宋庆龄生平事迹展》展板，去



街道、上学校、到部队进行巡展。我们还和街道、大学、中学、部队建立了共建单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些活动我都全程参与了。

我调到文物资料部工作后，主要负责文物修复和复制工作。

修复文物首先要忠于历史，在原件存在的基础上，对原件进行复原，恢复文物的本来面貌，把缺损的部分增补，将文物修复完整，在修复的位置尽量做到接近原件的样式和风貌。

我印象最深的是对主楼中陈展区的部分文物家具进行修复。当时主楼二楼卧室里有许多家具表面油漆多处剥落，还有缺损。我将它们分门别类，将一套藤木家具、冰箱、藤椅、茶几、椅子、



▲ 作者在清洁宋庆龄雕像

橱柜等都逐一进行了修复。

至今宋庆龄故居主楼进行了两次大的修缮工程和多次局部维修，特别是2006年的一次大的修缮工程，对主楼二楼结构进行了局部加固。2006年大修竣工以后，我们重新恢复了二楼的开放，将修复好的文物家具重新放在故居里展示，大家都很满意，一个完整的故居陈列又重新展示在观众的面前，受到了各方面的赞扬。

一个成功的展览，如果没有文物展示对观众就没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因此文物在陈列展览中的位置十分重要，但部分珍贵的易损文物长时间展出对保护不利，特别是一些纸质的文献，它们对光照、温湿度非常敏感，容易褪色脆裂，于是馆里要求部分展品以复制件代替展出。我负责的文物复制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只能边学习边实践，根据需要逐步复制。

2005年下半年，宋庆龄生前好友高醇芳女士来我馆洽谈办展，根据展览需求，要将存放在故居内的高醇芳女士与宋庆龄来



往的书信、杂志、画册、贺卡等五十余件文物进行复制。我先后两个多月在某单位进行复制，按纸质类文物复制要求进行制作，克服了种种困难，后期我还对复制件进行了加工处理，达到了忠于文物原件的复制要求，完成了这项任务。展览布展过程中，我也参与其中。要复制出高水准的文物作品，就必须对文物原件的年代、质地、色泽、风格、形状、规格等进行仔细研究，这样复制出来的文物可以更加逼真。

2008年，上海宋庆龄故居文物馆要进行改版，大量宋庆龄的书信、文稿、杂志、书籍、图片、出国护照和书画等需要复制，其中还包括一些实物。我先后五个多月在相关单位进行制作，在这次复制中有馆藏一级文物，还有宋庆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赴欧洲多国的护照等。在复制这两件文物时难度比较大，首先是纸张，然后是颜色，在反复多次的试验后，终于复制出比较满意的效果。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纸质类文物，如毛泽东、周恩来1949年致宋庆龄的信以及宋庆龄的中国国民

党党证等都有一定的难度，但我本着认真的工作态度，抓住细节和特点一样样完成了任务。

三十年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立足上海，同时把展览送到了南京、重庆、广州、安徽、湖南、台湾，今年还与日本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联合办展，充分宣传了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也带动了故居纪念馆宣传教育、藏品管理、学术研究等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促进了故居纪念馆的创新发展。

近三十年来伴随着故居事业的发展，我逐步成长。在党组织的关心和自己的努力下，1994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宋庆龄故居成立以来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去年我又通过了文博专业中级职称的评审，并被聘为文博馆员，成为专业的文物工作者。我为自己能在故居工作而深感自豪和骄傲，并会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

## 情系宋庆龄故居

周炳揆

【编者按】周炳揆，职业经理人，经常为报刊杂志撰文。他秉承母亲对宋庆龄的崇敬之情，十多年来坚持代表母亲向故居捐款，并将故居回赠的门票送给周边居民，让更多的人感受和学习宋庆龄的精神风范。

宋庆龄故居位于我家对面。推开窗户，可以看到这幢精致的欧式别墅静静地卧在香樟树、广玉兰树丛中。假三层有一个圆弧形的老虎窗，屋顶是暗红色的瓦，屋顶上有两座设计精美的白砖砌成的烟囱。

有许多童年时代的回忆围绕着故居。首先是放鸽子，宋庆龄先生喜欢鸽子。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每天早晨和傍晚，一群白色的和平鸽围绕房子和花园飞翔，鸽子的脚圈上套着鸽铃，放飞时“嗡嗡”作响。早晨，背着书包上小学，总觉得故居的白色围墙



▲ 故居武警

很高，也很长，围墙顶上有漆成绿色的铁杆，还有圆圆的瓷圈（后来知道这是电网）。故居的大门是绿色的，大门外的岗亭是绿色的，岗亭内有目不转睛、持枪站岗的警卫，他的制服也是绿色的。

195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故居周围隔壁的弄堂一下子停满了汽车，从我家六楼的窗口望去，故居前花园的草坪上摆了小方桌，桌上铺了白布……后来知道，那天，宋庆龄先生在家中招待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





宋先生作古后，故居对外开放，供游客瞻仰。我陪过许多外国客人去故居参观。有一次，我陪俄勒冈州立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史的布洛德女士参观，她对陈列室里的展品是那样的感兴趣，作记录，问问题……一直到工作人员很有礼貌地提醒我：“闭馆时间到了。”我终于发现，布洛德教授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实在是非常有限。

我母亲晚年患帕金森氏症，行动不便。我经常用轮椅推她在周围街道散步，宋庆龄故居和它的前花园是母亲最常去，也是最爱去的地方。她逝世前的最后一次户外活动，也是在宋庆龄故居。

---

（上接 42 页）  
计上岗证、电脑帐务处理等等。

我还在文物资料部工作过几年，期间我认真做好陈列文物数据整理和保养保管工作。故居大修期间，我每天对周边环境进行安全检查和巡视，发现问题及时跟领导汇报并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工作兢兢业业。

故居已经走过了 30 年，各

那是一个阳光和煦的秋日，她指着房屋右侧的那株大树说：“广玉兰树长高了……。”

母亲去世了。我们兄弟姐妹决定，每逢母亲逝世的周年纪念日，我们在母亲遗款中取出一部分，捐献给宋庆龄故居，以表达对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女性的崇敬，也寄托了我们后辈对母亲的怀念。十六年了，宋庆龄故居的馆长换了一任又一任，我们的纪念捐赠从未中断。陆柳莺馆长感谢我们，送我们参观故居的赠券。我们把赠券通过武康、康平里委，转送给社区居民，让更多的人参观、欣赏这座精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庭园。

项事业都取得了可喜的进步，这都是许许多多领导和员工长期努力奋斗的结果，我作为其中的一分子，贡献自己的汗水和智慧，觉得非常自豪。这么多年来，我在工作中学到了很多，也锻炼了自己的工作能力，各方面都得到了磨砺。衷心希望年青一代能继承和发扬故居的优良传统，保护、宣传好宋庆龄故居。

##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建馆 30 周年特刊

主 编 金晓春  
副主编 董 卫  
          陆柳莺  
策 划 麦灵芝  
执 行 王宁宁  
校 对 宫洁菁

主办单位：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1843 号

邮编：200030

电话：021-64718833

传真：021-54654810

网址：[www.shsoong-chingling.com](http://www.shsoong-chingling.com)

投稿邮箱：[wnn0828@163.com](mailto:wnn0828@163.com)

内部发行 免费交流